

研究議題討論

台灣的人口遷徙及勞工流動問題回顧： 1980-2000*

林季平

* 林季平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副研究員、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jplin@gate.sinica.edu.tw)。本文係國科會支持作者有關人口遷徙及勞工流動系列研究計畫的綜合成果 (計畫編號NSC 89-2415-H-194-026、NSC 90-2415-H-194-015、NSC 91-2415-H-194-009、NSC 92-2415-H-194-009、NSC 92-2412-H-001-042、NSC 93-2415-H-194-009)，作者在此表示感謝國科會長期的支持，作者亦要感謝二位匿名評審、張荳雲、張晉芬、及楊靜利三位教授的批評及建議，劉曉融及張家榮協助資料蒐集及整理，及劉曉融和黃奕嘉的行政協助。本文疏漏難免，歡迎批評及建議。

收稿日期：2004/11/8，接受刊登：2005/4/4。

中文摘要

本文主要目的在根據既有文獻回顧二十年來台灣的人口遷徙及勞工流動相關的社會及經濟問題，重點涵蓋四大議題：（1）遷徙衍生的區域及都市發展問題、（2）內部遷徙及邊際勞工流動問題、（3）跨國遷徙問題、及（4）「門戶開放」後的衝突和矛盾問題。首先，由於1980年代末台灣勞工流動發生重要的「逆轉」情形，人力由傳統南北分流變為至北部的淨移轉，致使台灣的區域及都市產生進一步極化發展的問題，因此區域人力資本的質與量不平衡的問題比以前更加嚴重。有關內部遷徙的問題，政策應設法促進市場資訊開放及流通，以減少不必要的重複遷徙；台灣的失業勞工流動在促進失業者再就業的效果似已出現失靈的情形，該現象令人憂心；如何防止被迫離職者潛在問題在未來進一步惡化，有賴主動積極的勞動政策；而原住民勞工流動在提升原住民個人或家庭社經地位效果似乎不大，亦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在跨國遷徙的問題部分，對台灣內部影響最為深遠者為合法及非法外籍勞工問題；最後，門戶洞開後的衝突和矛盾問題主要源自外籍勞工對本國勞工就業已產生部分取代效果，且外籍勞工對低技術本國勞工的就業取代效果有部分反映在低技術本國勞工的內部遷徙裡面，外籍勞工對本國勞工流動雖沒有全面的排擠作用，卻有全面的阻礙作用。

關鍵詞：人口遷徙、勞工流動、內部遷徙、跨國遷徙、區域及都市發展

**A Critical Review of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Population and
Labor Migration in Taiwan, 1980-2000**

Ji-Ping Lin

Center for Survey Research,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Using a combination of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and the author's long-term research on migration patterns, this article presents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socioeconomic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population and labor migration to and from Taiwan during the past two decades. Population and labor migration apparently aggravate human resource distribution in terms of quantity and quality, in spite of its positive role in efficient manpower redistribution. A movement toward more openness with and greater circulation of labor market information is an effective means of reducing migration redundancy and the undesirable effects of marginal labor migration. In term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problems triggered by the importation of low-skilled foreign labor are more crucial than those associated with the immigration of foreign brides and the emigration of Taiwanese workers to China. Conflicts and contradictions between internal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re manifested via the negative impacts of immigrant workers on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for and internal migration of Taiwanese domestic laborers.

Key Words: population migration, labor migration, internal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gional and urban development

一、問題緣起及背景

本文主要目的在廣泛及系統性的回顧過去二十年來，台灣的人口遷徙（population migration）及勞工流動（labor migration）的動態變遷及其衍生的社會問題。¹人口遷徙及勞工流動是人力於勞動市場間交換及再配置的過程，誘發該過程的因子可視為勞動市場人力資本質與量供需不平衡所致。隨著科技進步與發展、交通運輸和通訊設施及效率的大幅改善，及近年來網際網路逐漸普及，經濟活動正朝向國際化及自由化邁進，區域經濟走向整合及分工已變成一種潮流及趨勢，故人力和資本的流動性亦日益擴大及加速，其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也將變得較以往更為重要。探討人口遷徙及勞工流動的重要性在於，隨著經濟結構的轉型，勞動市場對人力質與量的需求無可避免的亦會隨其結構性的調整而改變，若勞動市場人力無法有效地由萎縮的產業移轉至成長的產業，則會阻礙經濟結構轉型（economic restructurings）並影響到經濟的發展（Lewis 1982; Dijk et al. 1989; Todaro 1985; Stark 1991）。

台灣過去 50 年來的經濟發展已廣被外界視為重要典範之一（Ranis 1992）。回顧過去台灣經濟發展的過程，基本上是一內部產業結構不斷

¹ Labor migration 的研究是 population migration 的分支，研究主要著重在經濟及工作因素所引起的遷徙。本文的 migration 中文用詞會視研究議題而有所變異；population migration 的中文用法習慣上用「人口遷徙」或「人口遷移」，但 labor migration 則習慣用「勞工流動」或「勞動移動」。為求用詞一致，本文有關 population migration 的中文一律用「人口遷徙」，而 labor migration 則用「勞工流動」一詞。而文中所謂的「勞工」並不是傳統一般大眾所認知的藍領工作者，係指廣義的勞動人口，即就業者（包括雇主、受僱者、自營作業者、及無酬家屬工作者）及失業者。

變遷及調適的過程；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工業部門（特別是製造業）仍為台灣經濟發展的主體，嗣後服務業部門的成長動力及重要性則見大幅提升，並逐漸開始超越工業部門，此一趨勢於1990年代以後變得更為明顯。因此，台灣經濟結構的轉型過程基本上符合Solow（1957）的成長模式，即一國的經濟發展重心係先由農業，再至工業，最後至服務業部門的發展方向。環顧過去整個經濟發展過程，台灣人口及勞力調整機制相當有彈性，人口遷徙及勞工流動在勞動市場人力調節的功能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台灣過去若無有效的勞工流動機制，經濟必無從發展起來（Lin 1998）。

人口遷徙及勞工流動的動態變遷和區域經濟結構的轉型過程息息相關。台灣的經濟結構開始由農業全面轉型至工業的型態始自1950年代。當時政府採用「進口替代政策」以便發展國內的輕工業（Kuo 1983; Li 1988），致使農業勞工重新流向發展中的工業部門，並加速內部都市化過程。但另一方面由於土地改革的成功，農村勞工外流誘因及動機亦相對減少（Speare 1974；Clark 1989），該時期的台灣勞工流動雖然以農業至工業部門和由鄉村至城市的遷徙型態為主，但勞工流動就數量而言並不算太大（Speare et al. 1988）。

台灣內部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人口遷徙及勞工流動發生於1960年代中期，且該內部人力之大規模移轉持續長達10年之久（Lin 1998）。該大規模的人口遷徙及勞工流動和1960年代政府大力推動發展出口導向產業的經濟政策有非常密切的關聯。當時台灣的經濟發展策略係以政策性獎勵措施（如獎勵投資條例等）致力吸引國外投資，全力發展以出口為導向的工業用以刺激出口賺取外匯。該經濟發展策略在當時確實扮演一非常重要且成功的角色，不僅促成勞力密集產業快速成長，也為台灣後續的經濟發展奠定基礎（Ranis 1992）。

由於勞力密集出口導向的工業快速發展，勞動市場對人力之需求大幅提高，大規模的農業至工業部門勞工淨移轉於是發生，並導致大規模的農村至城市勞工遷徙（rural-to-urban labor migration）及快速的都市化過程。此一重要的經濟發展階段，若無如此有效且快速的部門及區域人口遷徙及勞工流動來支援工業部門高度的人力需求，台灣的經濟發展則無從奠下日後成功的基礎（Lin 1998）。

然而1970年代初第一次石油危機及該年代末的第二次石油危機，對台灣的經濟結構產生劇烈的衝擊及影響。第一次石油危機使工業部門經濟生產受到相當程度的打擊，由於產值的萎縮，當時曾發生小規模由工業至農業部門的勞工移轉情形，和城市至農村的勞工回流遷徙（return labor migration）。但第一次石油危機後台灣的經濟很快恢復活力，上述的人口遷徙及勞工流動方向之「逆轉」只是暫時的現象，很快的勞工流動就恢復原來「主流」的方向，即仍以農業至工業部門之淨移轉和鄉村至城市勞工遷徙的型態為主（Lin 1998）。至1970年代末，我國已面臨外交逐漸失利連帶引發的國內政經結構劇烈變化、農業部門剩餘勞工逐漸枯竭、中國打破長達30年的鎖國政策，及東南亞諸國等新興經濟體興起等因素，台灣傳統勞力密集產業已不復或即將失去國際競爭力，故除了社會及政治結構已開始進行階段性及結構性的調整或重組之外，台灣的經濟結構亦進行另一波結構性的轉型。

所以1980年代台灣經濟結構轉型的政治及經濟背景可分為國內和國外兩大因素。國內因素主要係傳統的權威政治體制（authoritarian polity）已逐漸由1970年代及之前所謂的強硬權威（hard authority）轉變為所謂的軟性權威（soft authority）。實施數十年的戒嚴令更於1987年宣布解除，使得社會發展及經濟活力變得更加活潑及多樣化，個人的社會及職業流動速度加大，奠下日後經濟自由化和國際化的基礎（Copper 1988;

Clark 1989)。在社經背景部分，當時政府部門對經濟結構轉型的政策是希望國內的經濟結構朝資本密集方向發展，但由於第二次石油危機的震撼，該項政策立刻修正為以發展技術及知識密集（如電子資訊工業）的產業為主（Gold 1986; Li 1988）。事後證明，該項政策的逆轉對1980年代以後的台灣經濟發展有一既深且廣的影響。

因此雖早自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台灣的經濟結構已開始轉型，但轉型的結果及成效尚不明顯，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以後，台灣的經濟結構始見另一波大幅及明顯的變化。其中最重要的特徵是服務業占國內生產毛額的比例開始快速上升，而工業部門所占之比例則開始下滑；此時另一重要特徵是工業部門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比例於1980年代中期達到高峰後亦見開始下滑，而服務業部門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比例則見快速攀升，故1980年代中期以後台灣的經濟結構朝服務業發展之態勢已初現端倪。由於1985至1990年間台灣的經濟狀況非常適合服務業的發展，但對工業部門（特別是傳統的製造業）卻相當不利，所以該時期勞工流動特徵是開始出現由工業部門至服務業部門移轉的現象。

故過去二十年來的發展，1980年代是台灣政治、經濟及社會發展非常重要的一個轉捩點。政治發展方面，傳統社會階層及權力架構開始鬆動及重組，個人及整體社會流動性加大。當時政治自由化亦對促進經濟自由化及服務業的發展有相當大的間接正面效果，該效果至1980年代中期已逐漸顯露出來；經濟發展方面，自1970年代末政府決策部門已察覺，我國傳統出口導向勞力密集產業的競爭優勢將隨中國改革開放及東南亞經濟體之興起而降低，認為有必要加速推動經濟結構轉型。當時對轉型策略有相當大的爭議，但由於第二次石油危機（1979-1980），決策部門於是推翻原先以發展資本密集產業（如石化、汽車及鋼鐵等）為主的轉型策略，改採技術密集策略，新竹科學園區的設立便是該政策具體

化最好的例子。

當台灣的政經及社會結構於 1980 年代末進行重組時，台灣的區域勞動市場及勞工流動大環境亦面臨結構性的轉型及變化。例如南部高雄地區石化及重工業深受兩次石油危機影響，加上其傳統產業無法跟上內部經濟結構轉型的步調，致使以高雄都會區為核心的南部區域經濟開始沒落；由於服務業及新興工業發展所衍生的經濟利益（如工作機會等）在地理分布上主要集中在北部的台北及新竹地區，這使北部地區的勞動市場吸引力更見進一步強化。

1990 年代台灣的經濟發展已進入另一個新的階段，特點是經濟結構轉型的效果開始顯現及所面臨的國際競爭增大。1990 年台灣經濟的發展方向及轉型結果已相當明確，係以服務業及高科技產業為主，勞工流動係以工業至服務業部門的人力移轉為主。此時台灣所面臨的社經大環境變遷和國外已開發國家過去的經驗類似，例如由於內部經濟活動的去工業化（deindustrialization）及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結果，製造業普遍開始衰退，致使對高級人力的相對需求加大，但該新類型的經濟結構亦會同時創造出大量的低階工作機會來提供高級經濟活動所衍生的勞務需求，而中級的就業機會（如行政人員和買賣工作人員等）則會相對的萎縮（Sassen 1988）。²此外，台灣內部經濟亦進一步朝自由化及國際化前進，該演變具有進一步深化內部經濟活動核心和國際經濟活動連結的作用，這些新經濟核心即所謂的國際城市（global cities），其所屬產業擁有一共同特徵，那就是以高度專業服務業和高科技產業為主（Sassen 1991），台北市即為一明顯例子。

² 去工業化（deindustrialization）及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的解釋，請參考 Sassen（1988: 126-127）。

1990年代我們亦面臨另一個非常重大的資訊技術革命性變革，該變革衍生的結果之一是產生所謂的新經濟（new economy）及導致資訊社會（information society）的崛起（Castells 2000），並對我們原本習以為常的工作及居住安排、生產模式、社會組織和政治結構產生重大影響及衝擊。所謂新經濟，按Castells（2000）的定義係經濟活動資訊化和全球化後的新生產模式，並具有勞動、資本、技術和市場等要素以全球性規模，藉由網路密切整合及要素流通速度比傳統模式快速等特性。面對上述變革時，我們所面臨的社會經濟環境已截然不同於Bell（1976）、Kendrick（1961）、Solow（1957）、及Toffler（1980）等工業主義（industrialism）或後工業主義（post-industrialism）學者所強調的面向。

因此1990年代自由化及全球化已帶動和以往全然不同的勞動需求及就業型態，由於阻礙生產要素流動的因子（如勞動市場不完全訊息及貿易障礙等）在面對新興的網路及加入WTO後，限制將逐漸減少或被打破，這些變化對人力移轉必產生結構性的影響，勞工流動對人力資本及行業別的選擇性將會變得更為顯著，除了內部勞工流動已產生結構性的變化外，台灣勞工流動另一重大變遷是跨國勞工流動對本土之影響日形顯著。

在簡要地回顧台灣過去二十幾年來政經及社會發展趨勢，及人口遷徙和勞工流動的變遷背景後，本文接下來進入人口遷徙及勞工流動問題的主題，計分四大部分來討論：（1）遷徙對台灣區域及都市發展的影響、（2）內部遷徙（internal migration）問題、（3）跨國遷徙（international migration）問題、及（4）內部遷徙及跨國遷徙的衝突和矛盾。本文先討論遷徙對台灣區域及都市發展影響的議題，主要目的是藉由探討過去二十年來的總體大局變動，先給讀者台灣人口遷徙的長期圖像和趨勢。而內部遷徙的問題是過去二十幾年來都一直存在的，但跨國

遷徙問題則是台灣於1980年代末期「門戶開放」後才逐漸顯露出來的。由於跨國遷徙對台灣內部的影響於1996年後方才逐漸顯著，故內部遷徙及跨國遷徙的衝突和矛盾亦於1996年後才轉趨白熱化，不僅成爲社會經濟重要議題，亦爲政治重要議題。

本文架構如下，第一部分將重心放在人口遷徙及勞工流動對台灣區域及都市發展影響（*impact of migration on regional and urban developments*）所衍生的問題；第二部分除探討台灣內部遷徙一般問題外，亦進一步探討邊際勞工流動（*migration of marginal labor*）相關問題，重點將擺在失業勞工流動（*migration of the unemployed*）、被迫離職（*migration of involuntary job change*）、和原住民勞工流動（*migration of Taiwanese aborigines*）問題；³第三部分則討論跨國遷徙的問題，除了一般問題回顧及討論之外，重點著重在低技術外籍勞工引進（*importation of low-skilled foreign labor*）、本國人才回流（*reversal of brain drain*）及外流問題（*brain drain*）；第四部分的主軸是探討「門戶開放」後內部遷徙及跨國遷徙的衝突和矛盾，重點擺在低階外籍勞工（以下用「外勞」一詞）與本國勞工（以下用「本勞」一詞）工作機會衝突問題和跨國遷徙對內部遷徙的影響（*impact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n internal migration*）問題；最後是本文結論及相關問題的進一步討論。

³ 邊際勞工是典型的弱勢勞動團體，邊際勞工沒有很明確的界定方式，但在概念上，若一個勞動者因自身或因社會、政治、經濟、制度、及文化等環境之主客觀因素而在勞動市場之相對競爭力不足時，即可界定爲邊際勞工。目前我們熟知的邊際勞工典型例子是例如年齡偏高且（或）人力資本偏低的勞動人口，其特徵是技術水準及生產力偏低，使得相較於其他勞動人口，邊際勞工之工資較爲低落及就業安全較沒保障。

二、遷徙衍生的區域及都市發展問題

遷徙和區域及都市發展息息相關，遷徙影響區域及都市的人口成長、人力供需、居住品質、和社會經濟發展，而區域及都市發展的結果反過來會影響遷徙的型態及特徵。在討論遷徙和區域及都市發展的相關問題時，我們必須了解台灣的區域及都市發展的基本變遷過程。台灣在不同的發展階段，都市體系及區域發展皆呈現出不同的面貌；日治時期主要受台日間農工分化的貿易往來及後期工業化政策影響，台北—高雄南北雙極（dual poles）的都市發展態勢及台北的區域優勢已然成形（Barclay 1954；章英華 1986、1997）。

戰後至1980年代台灣的區域及都市發展亦有其階段性特徵。1950年代主要特色是延續日治時期發展態勢，但都市化已日漸明顯，1960年代至1970年代初期則是快速都市化時期，主因係快速經濟發展及大規模城鄉遷徙所致；至1980年代台灣經濟結構進入另一波轉型，都會區中心都市成長已見緩和，但周圍城鎮則快速成長；在此過程中，台灣大都市的層級基本上仍是台北高雄兩大都市分立局面，台中則在1950年代以後取代台南先前的都市位階（Liao 1988；章英華 1997；孫清山 1997）。

經由人口遷徙及勞工流動，台灣人口的再分配呈現不同的型態及特徵，主要的動態變動方向是由日治時期的相對分散逐漸轉變成為目前的相對集中，人口重心開始由南部逐漸移至北部及向都市集中（熊瑞梅 1990）。由於日治時期南北雙極區域發展的結果，台灣整個人口配置亦開始呈現出極化現象；在這人口再配置的過程中，較特殊的是台灣北部從早期次要人口集散中心逐漸轉變成為主要人口集散中心，最後再蛻變為台灣最大的人口集中地區（施添福 1979；陳寬政 1981）。⁴台灣在1960年代中期由於快速的工業化，開始出現內部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城鄉遷

徙 (massive rural-to-urban migration)，大量的農村勞動人口移轉至都市的工業部門，該過程持續將近十年，並對台灣區域及都市發展產生無比深遠影響 (Speare 1974；Speare et al. 1988; Mullan et al. 1998; Lin 2000)。

雖然 1970 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造成部分都市往鄉村的回流潮，但由於此時鄉村已失去以前吸納剩餘回流人力的能力，回流遷徙這時並沒有對鄉村區域發展及區域人力再分配有實質貢獻及明顯影響力；1970 年代亦是台灣政治及社會經濟發展重要轉型的年代，雖然政策鼓勵新興產業朝資本及技術密集的方向發展，但由於轉型的效果尚未出現，台灣的區域及都市發展方向並沒有太大變動，人口遷徙及勞工流動型態基本上亦沒太大改變，只是遷徙數量開始逐漸降低；故 Lin (2000) 指出自 1930 年代中期至 1980 年代初期，台灣整個人口遷徙及勞工流動係呈現南北分流的型態 (參考圖 1)。

前述時期裡，陳寬政及廖正宏 (1984) 發現都市成長是造成人口遷徙的外在因素之一，經濟發展所產生的新興行業成為人口移入的焦點，就業機會類型之差異導致對不同教育程度勞動需求；其研究顯示人口吸納區主要以年輕及高教育程度者的移入為主，但人口外移區則因為年輕及高教育程度人口外移導致其人口組成老化及人力資本下降等問題，致使人口外移區的生產力因而偏低。如果移入都市地帶人口等待就業時間過長或就業困難，則都市的傳統部門易形成不充分就業的情況及間接造成社會問題。

⁴ 台灣從 1895 年進入日本帝國的管轄之後，因為日本殖民政府政策成功的切斷台灣和中國的聯繫，台灣的人口乃逐漸演變為一個近乎封閉的系統；雖然台灣人口在 1945 年末期到達大約六百萬，但 1895-1945 年間台灣人口的成長率是非常接近自然成長率的。



圖1 人口遷徙趨勢：1935-1985

蔡宏進（1986）則發現於都市化過程中，鄉村與都市間就業連結的問題主要是牽涉到就業者與城鄉兩地結構的關聯性。在都市化過程中，就業人口的空間分布一般都先集中而後分散，都會區人口社會經濟地位的空間分布係呈現低社經地位者先從鄉村移往都會區周邊鄉鎮，待其社經條件與地位改進後再移入中心都市的情形；由於鄉村就業人力大量移往都市的結果，導致鄉村的社會及農業結構都受到衝擊。陳肇男（1990）探討轉型後的1980年代台灣各類型遷徙者之特徵以及遷徙選擇性是否有漸進性；主要研究發現是人口轉型末期的台灣，年齡的選擇性呈現漸進型態，而職業與教育只在幾類遷徙中有顯著影響力，基本上是認為這些結果是受到生命週期的影響。邊瑞芬（1991）研究1979至1988年間台灣各縣市人口淨遷徙量，發現社經發展差距愈大則人口淨遷徙率差異愈大。

Lin (1998) 和 Lin 及 Liaw (2000) 依行政院主計處 1990 年普查及歷年內部遷徙調查，發現 1980 年代中期以後台灣勞工流動主要型態係人力資源由其他地區至北部地區（特別是台北縣市及桃園縣）的淨移轉，該項遷徙型態和 1930-1970 年代間勞工向南北分流的型態完全不同，因此 1980 年代可稱為台灣勞工流動「逆轉」的年代（參考圖 2）。此重大人力配置變遷對 1990 年代台灣政經、社會及區域發展有深遠影響，致使 1990 年代是台灣人口分布再次洗牌的重要時期。究其變遷大局係台灣內部經濟結構轉型和區域勞動市場的結構性變化，台灣新興工業及服務業多集中在北部地區（如新竹科學園區和台北市），及南部區域經濟結構轉型調整速度和總體經濟結構轉型步調不一致所致。⁵

Lin 及 Liaw (2000) 的研究進一步指出，台灣人口遷徙及勞工流動對產業及區域經濟結構轉型扮演非常重要的正向角色，其特色之一是遷徙的效率很高，遷徙的方向則和產業及區域經濟結構調整的發展方向一致；例如南部地區的重要都市高雄市在 1975 年之後淨移入人口明顯下降，北部地區的台北縣市成為最具吸引力的地區，影響範圍於 1990 年代中期後甚至擴展至桃園地區，使中壢桃園都會區成為近十年來人口成長最快速的地帶，從 1990 年至 2000 年人口計增加了 31.4% 之多（行政院主計處 2000）。

勞工流動對區域人力資本質與量的組成有很大影響，初級及連續勞工流動係正向的教育選擇，回流流動則是負向教育選擇；但影響力最大

⁵ 高雄區域優勢的衰退不僅跟經濟有關，政治也是可能因素之一。就經濟因素而言，高雄的衰退主要是受兩次石油危機的嚴重打擊其優勢的勞力密集、重工業、石化工業；就政治因素而言，「美麗島事件」對當時執政的國民黨政體是相當嚴重的挑戰，這可能削弱了當時執政的國民黨日後對南台灣區域經濟發展的支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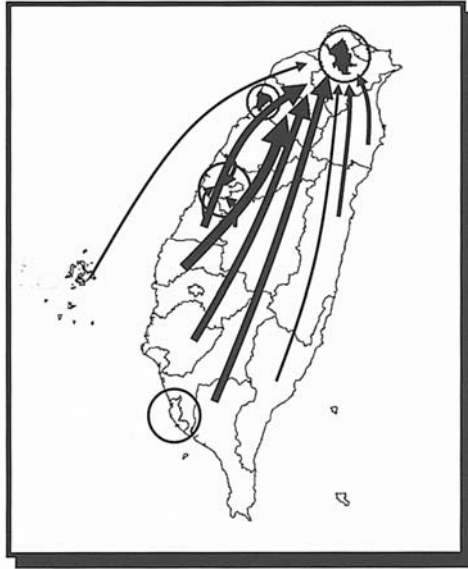


圖2 人口遷徙趨勢：1986-2000

者一般而言是初級勞工流動，只有少數情況下重複勞工流動才有明顯的影響；初級勞工流動的流動方向是鄉村往都市，回流流動則是都市往鄉村，連續流動則是都市間人力的移轉（Lin and Liaw 2000）。

另由於1980年代末至整個1990年代台灣的區域經濟結構及區域勞動市場就業結構已產生巨大變化，新的經濟結構已產生和以往全然不同的勞動需求及就業型態，致使人口遷徙及勞工流動（無論是區域或產業）的教育選擇性變得特別顯著。這種強烈的遷徙教育選擇性對台灣區域及都市發展有一負面效果，即造成台灣區域的人力資本質量分布進一步惡化的問題（Lin and Liaw 2000）；例如農業地區係典型的人口淨流失地帶，但由於流失人口以高教育程度者為主，故遷徙是造成農業地區人力資本惡化問題主要根源；台北市則對低教育程度者有很強烈的排擠作

用，其主要吸納者以高教育程度者為主，故遷徙對台北市的人力資本改善扮演一正向角色；台北縣及桃園地區雖然吸納人數總量最大，但由於吸納的人口教育選擇性不明顯，故遷徙對其人力資本質的改善並沒太大作用；高雄市不僅吸納人口總數不多，且其遷徙的教育選擇性並不顯著，故遷徙對高雄市人力資本的質量事實上影響不大。

洪嘉瑜等人（2003）探討區域遷徙與地區別勞動市場之間的關係，利用一般均衡模型（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包含短期個人在既定市場價格下所作的最適決策與長期所有市場調整趨向均衡兩部分，結果發現台灣各縣市的遷徙行為深受經濟誘因的影響。這些誘因包括地區別的相對就業機會、相對薪資與相對產業結構越有利者，越能夠吸引遷徙者遷入；產業結構的改變導致的相對薪資增加，所引發的遷徙動力相較於純粹相對薪資上升所引發的遷徙動力更為強烈。隱含政府若要平衡區域間人口的差異，調整地區的產經結構遠比降低區域性所得稅更為有效。

此外，由於快速興起及日益普及的資訊網路對資訊流通已產生另一波重大變革及影響，林季平及柯音如（2004）探討勞工流動及資訊流動的關係，發現勞工流動及資訊流動空間的型態相當一致，資訊在勞工流動決策過程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勞工流動及資訊流動空間的型態相當一致，越是資訊充分的地方，當地的人民越能克服資訊的限制，勞工流動的比例就越高；該研究指出網路運用並不必然對克服個人資訊取得的時空限制產生均質作用，由於資訊運用及勞工流動雙重選擇影響下，台灣的勞動市場人力配置預期將會進一步呈現兩極化的現象。

簡言之，經濟結構的轉型和全球化的浪潮明顯改變台灣區域經濟發展結構以及勞工流動的趨勢，台灣發展較為緩慢的區域皆面臨人口流失問題，整個台灣的人口遷徙及勞工流動仍舊是往都市集中，特別是北部地區。台北市顯示出很強的選擇高教育程度勞工特質，對於低教育程度

或是低技術者則有明顯的排擠作用；另由於1980年代後期服務業的快速發展，亦使得台北市進一步吸引（不論是內部抑或跨國遷徙）眾多高教育程度的白領專業人才流入，類似的情形亦出現在以新竹市（台灣的矽谷）為核心的周邊地帶。

雖然人口遷徙及勞工流動具有促進人力資本於勞動市場中移轉的正面效果，但另一方面卻有惡化區域間人力資本的質與量不平衡的反向效果。這種「雙刃」效果對台灣區域及都市發展產生極化現象及發展的兩難局面；例如過去二十年來，人口遷徙及勞工流動的最大受益者當屬以台北市為核心的北部地區及和新竹地區，人口遷徙及勞工流動對增加台北市人力資本存量的貢獻並不大，但由於台北市對低教育程度者有高度的排擠效果及對高教育程度者存在強烈吸納效果，人口遷徙及勞工流動對台北市人力資本質的改進有著莫大的正面效果。

但台灣南部以高雄市為核心的地區，由1930年代開始的持續成長型態至1980年代中期後則見陷入發展停滯情形，人口遷徙及勞工流動對南部地區人力資本質量的影響力大幅減低，而其他勞工流動的主要輸家除了一些典型的農業縣外，也包含基隆和嘉義等經濟基礎較薄弱的地區，人口遷徙及勞工流動對這些地方人力資本的質量惡化現象則相當明顯，這對這些地方區域發展產生很大負面效果。

三、內部遷徙及邊際勞工流動問題

本節重點先回顧台灣內部遷徙的一般問題，接著將重點挪至邊際勞工流動的問題（主要探討失業及被迫離職者的勞工流動問題和原住民勞工流動問題）。首先，無論從理論預期及世界各國實證結果來看，人口遷徙，特別是勞工流動，是追求及促進個人及家庭福祉的重要方式，例

如遷徙者的終身所得通常比非遷徙者高是為明證（Sjaastad 1962; DaVanzo 1977; Grant and Vanderkamp 1980）。但大家所忽略的是，運用遷徙來促進個人及家庭福祉並不是單純的意願問題，重點在於遷徙的決策及過程是否出於自願及有能力付諸行動，加上遷徙是具有強烈選擇性的過程，我們看到的「成功」案例事實上具有某種程度的選擇性偏誤（selection bias）；換句話說，若沒有能力進行遷徙抑或遷徙係出自非自願性的決策，則這類型的遷徙結果（migration outcome）可能較易衍生一些社會問題，因此值得我們進一步關注。

相較於一般勞工，邊際勞工是典型的弱勢團體（disadvantaged group）。雖然邊際勞工沒有很明確的界定方式，但在概念上若一個勞動者因自身或因社會、政治、經濟、制度、及文化等環境之主客觀因素，使其於勞動市場的相對競爭力不足時，即可界定為邊際勞工。目前我們熟知的邊際勞工典型例子是年齡偏高或人力資本偏低的勞動人口，其特徵是技術水準及生產力偏低，容易失業及不易再就業（reemployment），或經常處於低度就業（underemployment）的狀態，因此相較於其他勞動人口，邊際勞工的工資較為低落及就業安全較沒保障。

本文探討邊際勞工流動的最主要理由是，過去二十年來台灣經濟結構雖已朝資本及技術密集方向轉型，一般勞動人口亦能受益於該結構變動帶來的利益，且多能跟上經濟結構轉型的腳步，因此我們基本上不用太過擔心一般勞工的調適問題。但問題是過去二十年來社會經濟結構轉型過程附帶產生「副作用」及「陣痛」亦讓我們付出相當驚人的社會成本，衍生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及紛擾，近年來結構性失業上升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究其原因，和我國的邊際勞工流動的機制出了問題息息相關。由於邊際勞工在勞動市場競爭力不足，和其他勞動者相較之下他們較難順利經由勞工流動獲得工作邀約（job offer），使得邊際勞工就業易

成爲一種社會問題，因此進行邊際勞工流動的回顧研究，對政策設計及問題解決，會有很大的效用。

(一) 內部遷徙的一般問題

爲了反映遷徙決策的行爲能力和社會問題關聯，較理想的方式是以遷徙經驗之有無，將遷徙分爲初級遷徙 (primary migration) 及重複遷徙 (repeat migration) 兩大類，初級遷徙係指沒遷徙經驗的人所做的遷徙，而重複遷徙是指有遷徙經驗者的再次遷徙。⁶有遷徙經驗的人再次遷徙後，不是移回原出生地 (或上次居住地或工作地，操作型定義視研究需要或資料性質而定)，就是繼續移到別的地方，前者稱之爲回流遷徙 (return migration)，後者則稱之爲連續遷徙 (onward migration)。因爲這三種類型的遷徙者之人格特質有相當大的差異，故在做相關研究時，我們不僅需要分辨一個人是否有遷徙經驗，也要進一步區分爲何有人決定回流，有人卻繼續遷徙至別處。

前述研究在國外很多，但台灣則相當罕見，主要問題出在資料限制。台灣研究這類問題者最早屬熊瑞梅 (1984、1988)，之後林季平 (Lin 1998) 進行大規模及系統性研究，台灣的初級、回流、及連續遷徙的輪廓才得以建立，後續相關研究亦陸續出現 [例見林柏生等 (2002)]。⁷根據 Lin 及 Liaw (2000) 的研究指出，台灣的勞動人口約有

⁶ 國內外學術界已證實，有遷徙經驗的人比沒相關經驗的人更容易再次遷徙，該現象和前科犯比無前科者更易犯罪的事實相當接近。究其原因，這和有遷徙經驗者比無經驗者更易掌握現況及其資訊成本 (information costs) 較低有很密切的關係 [例參考 DaVanzo (1981, 1983)、Long (1988)、熊瑞梅 (1984)、Lin 及 Liaw (2000)]。

⁷ 這一系列相關研究，詳 Lin 等人 (1999)、Lin 及 Liaw (1999, 2000)、Lin 及 Tsay

76%沒有任何遷徙經驗，這些無遷徙經驗者之遷徙比率（即初級遷徙）約有8%；而有過遷徙經驗的24%勞動人口裡，遷徙比率（即重覆遷徙）則高達14%，其中有39%選擇回流遷徙，61%選擇連續遷徙。這方面的研究結果指出，一個人能否遷徙首先須克服自身因素限制，但當一個人決定開始遷徙後，由於已經過勞工流動選擇性（selectivity）的篩選，個人因素之重要性會降低，主要決定因子是市場及其他社會性因素；重覆遷徙深受個人過去遷徙經驗、勞動市場資訊及條件、親友網路（kinship network）、和區域性資本（location-specific capital）影響。

台灣初級勞工流動的個人決策過程相當單純，但重覆勞工流動卻很複雜，重覆流動機制之複雜度實導因於回流流動，連續流動則顯得相對單純許多。初級及重覆勞工流動方向和1990年前經濟結構轉型及國際化造成的新興就業機會空間不均質分布有密切相關，遷徙的決策基本上係屬理性的經濟行為，但也受不少非經濟因素影響（Lin and Liaw 2000；Liaw and Lin 2001）。第一次遷徙後失業期間愈長者及第一次遷徙前工作尚未確定者較易對第一次遷徙結果感到「失望」，為「修正」上次遷徙錯誤決策，較易選擇回流而非連續快速遷徙，由於這些人主要係低人力資本者，使得他們較易失去再度向外探索新市場的「勇氣」；然而，重覆遷徙原因不一定和對上次遷徙結果感到失望有關，亦有部分原因是別處有較佳機會緣故（Lin et al. 1999; Lin and Liaw 1999）。

由於初級勞工遷徙者大都是「沒經驗」及「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年輕人，出外接受磨練雖有其風險，但初次的勞工遷徙亦是種人生學習經驗及經歷，對其往後選擇再遷徙找到適才適所的工作有某種程度幫助；因此若初級勞工遷徙的結果不令人滿意或別的地方有更好機會，而下一

步必須選擇連續遷徙至別的地方，由於這些人通常係可塑性強的年輕人，有「敢冒險」的人格特質及市場適應力強的特性，因此我們不用太過擔心這類問題（Liaw and Lin 2001）。

但若初級勞工遷徙者因對遷徙結果失望或調適不良而選擇回流，因為研究結果顯示這類型回流的人由於過去不成功經驗會有心理上陰影，由於「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效應（effect of ‘once burned, ten cautious’），回流後通常會失去原先「敢冒險」的特質，性格變成具有風險趨避（risk avoidance）及風險嫌惡（risk aversion），及市場適應性變差的傾向，對再次往外發展會有畏首畏尾的情形。但由於這些人的個人條件事實上並沒那麼糟，只是過去的經驗及資訊不足所致，因此政策設計上要特別注意鼓勵這類型的人「不要怕，應繼續再重新踏出一步」，消除其心理上的陰影，否則時間一久，這些人可能淪為我們在鄉下地方常看到的「遊手好閒」或「頹廢喪志」之人，終將成為另外的一種社會問題（Lin et al. 1999）。

（二）邊際勞工流動問題：失業勞工、被迫離職者、及原住民勞工

接著我們探討邊際勞工流動的問題，重點在失業及被迫離職者的勞工流動問題和原住民勞工流動問題。近年來台灣的失業水準不斷向上攀升，失業問題在台灣已逐漸惡化成急需解決的社會經濟問題。失業勞工再就業的方式雖然很多，但無論以何種方式，他們欲再就業的先決條件通常要經歷勞工流動，若我們無法掌握失業勞工流動機制，目前政策解決失業的效果必大打折扣。如何促使失業者再就業以改善失業問題，成爲一個迫切的問題。

解決失業問題的方式很多，但無論何種方式，失業勞工再就業時大

都要經歷勞工流動的過程。失業勞工經由勞工流動在別處獲得工作邀約將有助減少失業；但在真實世界裡，由於諸如個人及家庭的因素、就業市場資訊不充分、及個人獲致和處理資訊能力不同，加上勞動市場經濟、社會及文化等結構性差異，充分就業是不可能的，失業勞工的就業問題實際上根本不可能如此簡單的獲得解決。

國外探討失業勞工流動的文獻相當多，國外文獻1980年代所得到的實證研究結果多認為：由於失業勞工爲了獲得工作邀約，失業率和選擇勞工流動傾向基本上係呈現正相關，且區域或行業失業水準在驅動勞工流動的正向推力不若個人失業因素來的重要（參考 Herzog 等人（1993）的一篇著名文獻回顧及評述）。最近 Boehm 等人（1998）研究美國的例子發現，失業勞工透過勞工流動的方式仍是獲得再就業及工作邀約的最佳方式。

但有關台灣失業勞工流動的相關研究目前並不多見，國內會較缺乏失業勞工流動這方面研究的部分原因是，以前失業不是很重大的社會經濟議題，但最主要原因還是資料的限制。雖然如此，仍有些研究值得一提；例如林祖嘉（1991）應用工作搜尋模型研究失業期間和找到工作機會的關係，主要結論是找到工作機會和失業期間存在一正向關係；陳明郎（1992）提出一均衡搜尋模型，從理論探討形成高失業率的原因，他主要結論是失業工人及有空缺的廠商都沒有足夠的動機努力尋找工作機會及招募工人。

莊慧玲（1993）比較在職搜尋（on-the-job search）和失業搜尋（unemployment search）的效率，她發現失業者的搜尋效率顯著比在職者高，原因是失業者較在職搜尋者運用較多樣的搜尋方法，且其保留工資亦較低所致。黃台心及林志明（2001）的研究發現指出，男性較有可能從非勞動力進入就業和失業狀態，學歷越高者較易從失業狀態進入就業

狀態，而年紀越大越不易從就業狀態轉換至非勞動力狀態，也不易由失業轉至就業狀態。

最近林季平及章英華（2003）以1981-2000年「人力運用擬—追蹤調查」資料為基礎，探討過去二十年來台灣失業勞工流動整個變遷的大局，這使我們對失業勞工流動的實際情形較以往更能掌握。⁸該研究重點在探討失業勞工和就業環境變遷的關係、失業勞工流動對促進失業者再就業的效果及其變遷、及失業勞工人力移轉及配置的變遷等三個面向，研究的主要發現是：在1980年代時，有96%的流動失業者變為就業者，僅有4%在勞工流動後還持續失業；相較1980年代的流動失業者，1980年代非流動失業者的再就業成功率僅有58.4%，持續失業者則達16.1%。至1990年代時，流動失業者有84.2%再就業，有15.9%持續失業；相較於該期的流動失業者，非流動失業者再就業率只有56.8%，持續失業者則高達20.6%。因此前面結果說明了勞工流動是失業者再就業的重要關鍵因素。

該研究指出勞工流動在台灣雖然有促進失業者再就業的效果，但勞工流動在促進失業者再就業的效果於1990年代不若1980年代般有效，似乎有失靈的現象。例如，1980年代及1990年代非流動失業者再就業的比例差異不大，分別為58.4%及56.8%，持續失業的比例分別為16.1%和20.6%，退出勞動市場者分別為25.5%及22.6%；但1980年代及1990年代流動失業者再就業的比例則有顯著差異，在1980年代有96%的流動失業者再就業，僅有4%持續失業，但到了1990年代流動失業者再就業率降為84.2%，持續失業者則增加到15.9%。筆者認為台灣

⁸ 有關「人力運用擬—追蹤調查」資料庫產生過程、應用方向及限制，詳林季平及章英華（2003）。

勞工流動在促進失業者再就業的效果於1990年可能有失靈現象的立論依據，係根據前面的一個重要發現，即1990年代失業勞工流動對就業機會變動之敏感性比1980年代的情形更高，也就是說1990年代失業勞工流動比1980年代失業勞工流動更有效，但矛盾的是，1990年代勞工流動在促進失業者再就業的效果卻不若1980年代來的有效，也就是說失業勞工流動的再就業機制在1990年代可能開始出現問題。

林季平（2003）這個研究另一個很重要的發現是，1980年代及1990年代失業人力的移轉型態和特徵已產生很大的變化。在失業人力配置變遷部分，1980年代失業勞工主要淨移出地為花東宜蘭和雲嘉南地區，特別是花東宜蘭地區，其流動效率亦相當高；新竹苗栗地區當時係呈現淨流入，其高流動效率表示該地的失業者外流能力很弱且吸納外地



圖3 再就業失業勞工流動趨勢：1981-1990

失業勞工能力很強。至1990年代，最主要淨流入地變為台北桃園和中彰投地區，其餘皆為失業勞工之淨移出地，以花東宜蘭地區最顯著，但花東宜蘭地區的流動效率已不若1980年代般來的高了。

此外，1980年代及1990年代失業勞工的移轉型態已產生很大的變化（參考圖3及圖4），主要變化是失業勞工做跨區遷徙（inter-regional migration）的比重大幅減少而做區內遷徙（intra-regional migration）的比重明顯加大、失業勞工流動目的地選擇的多樣性（diversity of destination choice）減少、及北台灣成為失業勞工做跨區遷徙時最主要的目的地。而且台灣的就業者之失業風險事實上並沒有進一步惡化的情形，台灣近年來快速增加的失業人口，除一些短期因素的刺激之外，主要是過去十幾年來失業人口因再就業難度大幅增加以及退出勞動市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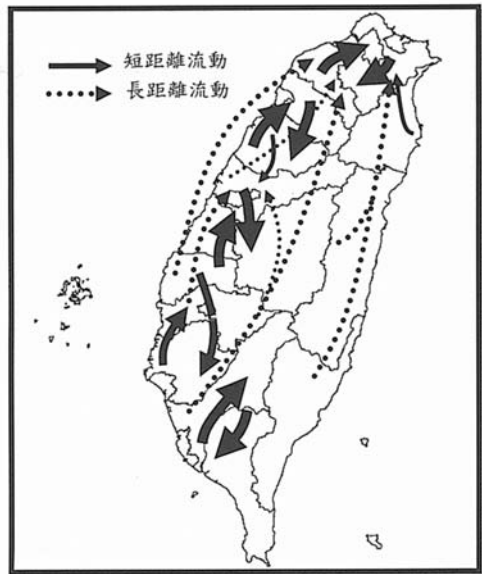


圖4 再就業失業勞工流動趨勢：1991-2000

意願降低而逐年累積的結果。

邊際勞工流動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被迫離職者的問題。蔡青龍及林季平（1999）和Tsay及Lin（2000）的研究發現，就經濟部門（即行業）間的勞動力移轉而言，有14%屬被迫離職者，而被迫離職原因，約72%係關廠歇業所致。若經濟部門結構是具有農業至工業，及再至服務業之階層性，發現經濟部門間的勞工流動（即所謂的業間勞工流動（inter-industrial labor mobility））階層性是存在的；也就是說，一般情況的勞工流動方向是農業至工業和工業至服務業的淨移轉，但對被迫離職者而言，其業間流動方向卻和自願離職者流動方向完全相反，即從服務業至工業，及工業至農業的傾向。因此經濟結構轉型所帶動的勞工流動的確有促進及提升個人福祉及社經地位的正向作用，但對被迫離職者而言，由於被迫離職者再就業的流動大方向和一般流動者不同，故被迫離職者再就業後，其個人福祉及社經地位可能有「降級」現象發生；由於該現象是一潛在不穩定社經因子，因此就政策面而言被迫離職者當值得政府部門進一步的關注。⁹

⁹ 行業和職業（位）都是類別變數（nominal variable），原本並沒有「高低」之分；若以社會學者常用的職業聲望（無論是主觀或所謂客觀）為例，我們習以職業的所得水準、社會地位等指標加以排序，使之成為具有次序（ordinal）特質的變數，然後用該次序來表示其職業聲望高低；現在換個角度來看行業，事實上行業在我們社會和職業類似，人們亦對行業有主客觀的社會評價及偏好。因為被迫離職者工作異動後流動大方向（服務業部門→工業部門→農業部門）和自願離職者完全相反，由於行業間有所得差距，這點至少說明了被迫離職者工作異動後其工資平均來說是下降的，這和一般的情形完成不同，故就所得而言，被迫離職者確有降級情形產生，又因為所得下降可能伴隨其他個人社經地位之降低，故文中才使用「降級」一詞。

接著我們探討原住民勞工流動的相關問題。¹⁰有關原住民勞工流動的議題，過去相關研究重點主要是討論地區性遷徙（張曉春 1974），文化適應與就業困境（瞿海源 1983；傅仰止 1985、1987、1994、2001），或社會階層流動（蔡瑞明 1984；黃毅志 2001）等問題。以上研究主要指出原住民遷徙到都市，本質上係為尋找工作機會和謀求生活改善，不過由於文化差異及語言隔閡，容易造成人力或社會資本的相對弱勢。

根據張曉春（1974）調查，台北原住民移民所往來的對象係以原住民為主，且多半不是共同遷徙就是相互介紹過來的，顯示其有同類相聚狀況。傅仰止（1985）認為原住民外移原因在於結構的「推拉效果」（push-pull effect）：山地農業的式微及就業機會不足為推力，而都會區工商業發達和勞力需求增加為拉力。原住民原居地之推力通常大於其拉力，但原居地的外在拉力亦可能成為遷徙主要原因；例如親友網路關係經常扮演外在拉力角色，原住民在同鄉協助下，親人聯繫經常變成外移的拉力。而近十幾年來，山地鄉的流失人口不斷增加，亦可能是表示外移原住民大多數是較永久的及非短期的遷徙（謝高橋 1991）。

許多相關研究都發現到台灣原住民遷徙到都會區以謀求工作，但因文化、族群及人力資本的關係而顯得其在勞動市場中位居較邊緣及社會底層的地位，且在經濟不景氣時亦屬最易受到負面影響的族群（傅仰止 1987；瞿海源 1983）。由於台灣原住民勞工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多數原住民勞工從事基層勞動工作，適應工作能力低於一般勞工，加上長期位於社會底層，其弱勢處境完全反映在其就業困境上。另外，城鄉發展的多樣程度明顯牽動人力資源的聚散效應，易形成高人力資本勞動力多聚

¹⁰ 根據《九十一年台灣原住民就業狀況調查報告》（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 2002），男性原住民失業率高達 14.76%，女性原住民為 15.02%。

集於都會區；低人力資本勞動力缺乏藉由勞工流動的機制，而留滯在原鄉（林穎寬 2002）。另外亦有研究結果指出教育對於原住民勞工流動是正向選擇性、年齡是負向選擇性。隨著產業發展，搭配新竹市半導體產業對於技術員的大量需求，也造成高中職教育程度原住民勞工淨流入較多的特殊現象（劉曉融 2004）。

雖然原住民遷徙存在一些問題，但遷徙對改善原住民之社經地位仍有很大幫助，原住民的遷徙和一般人口遷徙皆是理性選擇的結果，這和國內外的理論預期及實證研究一致，即遷徙是改善個人或家庭社經地位及所得水準最理想的方式之一；不過若從相對角度來看，雖然原住民遠較一般人有較高遷徙傾向，但由於原住民之總體社經地位及所得水準至今仍不若一般社會大眾，故遷徙在這方面的效果對台灣原住民相對上並不是那麼顯著。

綜合上述，對於一般內部遷徙的問題，政策的設計應特別留意減少「錯誤」的初級遷徙及「不必要」的重複遷徙，這樣才能有效促進遷徙在調節勞動市場人力運用的效率及減低遷徙社會成本和社會問題。在邊際勞工流動的問題部分，較迫切需要釐清的問題是，造成失業勞工流動在解決失業者再就業機制部分失靈原因為何；而被迫離職者相較於自願離職者，在離職後個人福祉及社經地位可能的「向下沉淪」問題要特別注意，理由是被迫離職者為數眾多，他們雖然尚有工作，但未來有相當高的可能性進一步淪為失業者及喪志工作者，故被迫離職者可視為未來潛在的不穩定社會因子，值得我們進一步關注以預防未來發生問題；現今原住民勞工流動最大的問題是勞工流動在改善原住民福祉的正面效果偏低，這根源於原住民的社會文化結構及其人力資本的限制，在面對台灣產業結構進一步變遷時，改善其就業窘境就須先從暢通勞工流動的機制著手。

四、跨國遷徙的問題

1980年代末台灣的政治解嚴具有進一步帶動經濟和社會解嚴的效果，促使台灣過去將近百年幾近封閉的政經和社會體系加速對外開放及整合，當中最顯著的變化之一是台灣封閉的人口體系及勞動市場開始對國際重新開放（Lin 1998）。當台灣正進行大規模的政經社會體系大變革的同時，另一波以知識經濟及資訊科技所帶動的全球化衝擊亦悄然來襲，這一波的新經濟發展及全球化亦產生兩個重要的新跨國遷徙趨勢，第一個趨勢是由跨國企業將工廠設備外移至生產成本低廉的國家所帶動的勞工流動，第二個趨勢則是由於冷戰結束使國界進一步模糊，開發中國家向已開發國家輸出勞工以彌補後者勞力不足（Potts 1990）。

上述變動使跨國遷徙在1990年代的台灣社會和經濟體系裡扮演愈來愈重要的角色，且影響力日趨擴大，近年來我國政府放寬跨國商業移民及籌設移民署，是為跨國遷徙及跨國勞工流動在台灣日益重要的明證。由於這波新國際化潮流已使國界進一步模糊，跨國遷徙及跨國勞工流動不再像過去和內部遷徙彼此涇渭分明，台灣近年來面臨的新興跨國遷徙問題，當中最重要屬（1）大量輸入低技術外勞、（2）經濟結構轉型所帶動的人才回流，及（3）和中國經濟整合度加深所引致的另類人才外流問題。

（一）跨國遷徙的一般問題

前述問題最重要的當屬大量引進低階外勞的問題。台灣當初引進外勞的基本原則是不能傷害到國人的就業權，故外勞應是扮演補充性的角色，亦不得妨礙我國產業升級（吳惠林、王素灣 2001）；隨著低階外勞在台數量增多，其對台灣的勞動市場及社會文化之影響層面及程度大

增，由於外勞人數不斷增加，而台灣近年的失業率卻不斷攀升，因此社會開始產生外勞是否已影響到本勞就業機會的爭議及質疑外勞政策的適當性。台灣有關外勞的研究相當多，所探討的層面也非常的廣，其中不少研究著重在外勞對本勞就業的衝擊。有關外勞對本勞就業衝擊問題的研究將於下節「門戶開放」後的衝突和矛盾中做詳盡的回顧及討論，這裡我們先依序探討台灣跨國遷徙的一般問題，接著進一步討論人才外流與回流問題。

在探討台灣的跨國遷徙問題時，我們要先了解一下人口遷徙及勞工流動在亞洲地區所扮演的角色。Prasai（1993）指出亞洲地區的跨國勞工流動變動趨勢和地區生產力變動有關，該研究範疇主要是探討在汶萊、香港、日本、馬來西亞、新加坡和台灣等國家的勞工流動情況，亞洲新興工業國家跨國遷徙的趨勢最早出現在1970年代早期的日本，Fields（1994）認為亞洲地區遷徙發展的轉折點是亞洲新興工業國家（台灣、韓國、新加坡、香港四小龍）由勞動輸出轉變到勞動進口的過程；台灣跨國遷徙屬較為晚近才發生的現象，但台灣跨國遷徙的特點是移入數量很大且增加的速度非常快速，主要的跨國遷徙移入來源是來自東南亞地區的勞工。

外勞在台灣的需求日漸增大及人數日漸增多和台灣內部社會經濟狀況及人口結構變動有關。Lee and Wang（1996）的研究回顧台灣外勞政策形成過程及所引進的外勞特質，並針對僱用與管理外勞的程序和措施等重大問題做探討，包括大量脫逃的外勞問題；由於筆者認為非法外勞很難調控，因此提出必須進一步限制僱用外勞。蔡明璋及陳嘉慧（1997）研究以經濟社會學的觀點切入來檢視外勞輸入所構成的人力市場，認為勞力仲介組織受到國家政策影響而呈現出特殊的非理性的市場行爲。

台灣的跨國遷徙不論是跨國移入（immigration）或跨國移出

(emigration)，有些學者認為並不盡然是國際人力供需問題不平衡所產生的，部分原因係跨國遷徙是居留權被商品化後的結果。例如，曾熾芬（1997）認為某些國家的居留權逐漸被視為是一項提供給資本擁有者的特權，故跨國遷徙亦可以視為移民商品化的結果之一；她進一步運用在台灣跨國商業移民的研究，據以檢視移民身分如何成為一種市場上的商品，以及移民市場壟斷性所產生的問題。另外，劉梅君（2002）認為過去對於外勞的既有文獻大多數是出自經濟學或管理學的觀點，外勞議題被視為市場供需或是價格問題；她認為外勞之所以廉價是相較於國內勞工的平均工資而言，但是若比較基準是東南亞或中國這些地區，顯然就不是那麼「廉價」了。

當跨國遷徙在台灣的影響力日益增大時，非法跨國移入亦變得日趨顯著。Selya（1992）指出自從1986年開始台灣已經有大量非法外勞的進入，在1989年時台灣估計有200,000個工人的短缺，估計每年持續有短缺50,000個工人。Tsay（1992）的研究指出大部分的非法外勞是以逾期居留方式進入台灣，用官方的數據發現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和泰國是主要的來源國，大約近乎40,000個非法的外勞仍滯留在台灣從事低技術的勞力工作，這些低技術的體力工作是台灣人較為不願意從事的工作。

（二）人才外流及回流的問題

人口於國際間遷徙的現象與各國間的經濟社會發展環境、產業發展政策以及相關因應的人力延攬政策有莫大關連。許多國家爭相吸引全球菁英前往居留，經由移民政策和經濟機會的提供，這些國家彼此競爭移民的人力與資本（Borjas et al. 1996）。許多有關台灣跨國遷徙研究多集中在台灣人口移出的面向上（楊成安 1984；謝高橋、蔡宏進 1989）。曾

熾芬（1997）根據中研院「社會意向調查」的資料指出，台灣有高達八分之一的人具有移民海外的意願；由於這些人通常是高教育程度、高所得、及具專業技能的年輕人，若移民海外對台灣而言將是種人力資源的損失。

跨國企業及外國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對台灣人才外流及回流的影響最為深遠。Kanjanapan（1992）從資本協助與非資本協助的移民觀點，就外國投資的資金流入與外國專業人士的遷徙進行分析；她發現台灣在1980年代外資與專業的移民數量不多，在1988年也僅有960人而已，外國專業人才的進入管道主要是透過跨國公司，並可能尋求資本與技術密集的產業。

然而跨國公司高技術勞工的跨國遷徙原因事實上是相當多元複雜的，Peixoto（2001）指出跨國公司的國籍與社會、組織結構類型、經營模式及個人等因素都會影響到人員的遷徙。Tzeng（1995）以在台的美商公司為研究對象，發現遷徙者的個人特徵（如個人能力、國籍、族群和性別）會影響跨國人力遷徙及其被指派的海外工作之上；該研究進一步指出隨在台外商公司而移居海外者約3%屬經理管理人員，3%至6%則為專業技術人員，這些跨國遷徙者通常從母公司到子公司或在子公司間轉移，較少發生由子公司調到母公司的跨國遷徙。

從台灣移出的商業移民相關研究中，發現在原居地有經濟能力的移民對於移入地也會產生相當的影響力，有些華人專業人士更進一步促成移入地及其原居地間密切的關係。目前移往北美與澳洲的華人遷徙者多屬技術與商業移民，以技術、投資和依親為主要動機且經常往返母國與移民國之間，這與過去移民型態完全不同，複雜性也較高（姜蘭虹等1998；Tseng 1995）。亦有研究指出相較於美國本土出生的美國人，華人移民偏好專業的或管理的職業，1990年超過72%的台灣移民從事專

業的或管理的工作（Chen 1998）。

至於跨國外移的專業人員問題，Chen（1995）檢視從台灣跨國遷徙到美國的人口其技術與能力的選擇性，其研究指出高教育程度者有較高的機會進行跨國遷徙，且選擇移出的台灣人相對於未移出者有著較高的技術與教育程度；在假設遷徙者選擇移動到目的地主要是希望達到終生所得最大化及得到較高人力資本的報酬。Chen（1995）進一步發現沒移民的台灣人之薪資分布比美國人或移入美國的台灣人較為對稱，美國出生和台灣移出者的薪資分布都屬右偏類型，這意味著擁有技術的人遷徙將有較高報酬。Chen（1998）進一步運用美國官方資料檢驗來自台灣、香港、和中國的華人移民團體的特質與在美國同化率的差異，其研究指出來自三地的美國華人的年齡、工資水準、教育程度、行業與職業分布有極大的不同，這三個移民團體的工資分布與美國出生的工人相較之下係呈現出變異較大的情況。

國外眾多研究發現許多跨國遷徙通常會有連鎖移民(chain migration)的現象產生。也就是說，遷徙時人們對家庭聯繫的價值與責任感及相互支援的情感，都會影響到他們選擇居住地，因而這些移民分布較為集中，再次空間聚集的過程非常明顯；例如，姜蘭虹等人（1998）及徐榮崇及姜蘭虹（2001）的研究發現，台灣外移至加拿大及澳洲的移民，數量非常大且分布地也有明顯集中趨勢，連鎖移民的效果非常顯著。但在Ip（2001）對華人移民澳洲進行比較分析，發現台灣移民者多屬高教育程度者，主要以投資或商業移民方式移居澳洲，但和移居澳洲的其他華人相比其勞動參與率卻是較低的，因為就業因素而有越來越多澳洲移民最後選擇回流至台灣。

相較於一般的跨國移出及跨國移入，人才外流對人才輸出國而言問題可能會比較大。自1960年代以來，許多開發中國家共同出現了一個現

象，那就是技術工人向外遷徙到已開發國家的情形發生，這就是我們所通稱的人才外流問題（Prasai 1993）。台灣過去也經歷過人才外流的困境，主因是過去政治因素考量，使得過去台灣呈現人口移出的趨勢，人口移入數量是微乎其微。台灣過去的人才外流主因係留學生出國（主要目的地是美國）未歸。Chang（1992）指出出國未歸原因深受社會、經濟和個人等因素所影響，由於滯外未歸者主要是剛畢業的學生，並非訓練有素的科學家或是工程師等專業技術人士，所以短期來看台灣人力資本流失的問題並不算嚴重。

雖然至1990年代台灣一般人口持續外流，但和過去的人才外流情形相較，台灣人才外流情形事實上開始出現舒緩情形，加上政治自由化與經濟結構轉型，台灣移民政策在「移出從寬、移入從嚴」的原則下，移民特性從傳統華僑移民轉型為技術性、投資性的高級知識性的移民，使得外國人遷徙至台灣及原本旅居國外的華人回流台灣的數量逐漸增多（姜蘭虹等1998；蔡宏進2000）。

相較於過去嚴重的人才外流，1980年代末及1990年代初台灣開始出現人才回流的情形，這些回流人才帶回了新的技術、商業投資資本及有價值的跨海網路關係（Chang 1992；Iredale 2000）。台灣人才回流的相關研究多集中在1980年代我國政府如何採取積極政策吸引台灣專業人才回國以逆轉台灣人力耗竭的窘境。

新竹科學園區轉變為今日全球高科技業的重鎮及其周邊地區的發展是為台灣人才回流最典型的例子。根據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截至1994年底的統計，已有超過77間高科技公司係由海外人才回來創立，而到1998年底止有2,859海外人才回流到竹科，其中多半來自矽谷，故整個新竹科學園區的發展歷程可以說與美國加州矽谷的人才回流間有著密切的關連。這些海外回流的人力在1990年代之後，對台灣新經濟生產體系

而言，扮演著研發者的角色，並成為重要新技術與新的經營方式的來源（徐進鈺 1999；Baum 1994）。

Tsay 及 Lin（2003）進一步使用 1990 年台灣的戶口及住宅普查資料，針對 1985-1990 年間跨國回流遷徙（international return migration）進行研究。研究發現回流至台灣者中有 10.4% 係來自中國，相較其他地區的回流者，來自中國的回流者以男性為主，其年齡通常較大且教育程度較低，由於當時台灣對中國投資金額尚不是很大，故這批回流者有一大部分應屬退伍老兵；而來自其他國家的回流者通常年紀較輕且學歷較高，回國後有超過 60% 係在服務業部門工作。總而言之，回流者中有很大的比例是擁有較高的教育程度，這對增加台灣人力資本存量有很大貢獻；這個研究亦發現新竹市是一個反映台灣人才回流現象的絕佳案例，因為新竹的回流者中，學歷為研究所以上者占 78%，這支持跨國回流者為教育菁英及高技術者的事實。

綜合上述文獻，我們知道 1990 年代台灣最重大變化之一是原本相當封閉的人口體系及勞動市場開始對國際重新開放，加上知識經濟及資訊科技所帶動的另一波全球化衝擊，致使跨國遷徙的角色及影響力在台灣日趨重要。1990 年代這波新興的跨國遷徙浪潮，當中最重要的屬輸入及引進大量低技術外勞、經濟結構轉型所帶動的人才回流，及部分人才外流問題。跨國遷徙會對移入國或母國的經濟、社會等許多層面產生莫大的影響，要如何調和其利弊將需要莫大的智慧，可預期的是跨國遷徙已然成為台灣所必須面臨的重大社會問題。

五、「門戶開放」後的衝突和矛盾

台灣自日治時期至 1980 年代末期之間，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1945-1950年間有大量的大陸人口移入以外，台灣的人口體系基本上係屬封閉的型態，這段期間台灣的人口成長主要來自內部的自然增加，和世界許多國家經驗相較之下，跨國遷徙並不是影響台灣人口成長的關鍵要素。前面提到，1980年代末台灣政經及社會體制劇烈變動促使台灣重新和世界體系接軌，加上內部結構性變動及服務業興起和教育年限延長，致使台灣在1980年代末期面臨嚴重的人力短缺。為解決企業高度缺工問題及因應六年國建等重大公共工程建設，政府因而核准營造業引進外勞（吳惠林、張清溪 1991）。台灣正式核准引進外勞是為台灣國際「門戶開放」的肇端，自此跨國遷徙的影響力日增，亦間接引起1990年代和台灣內部社經發展的一些衝突和矛盾。

我國在正式引進外勞來台工作後，台灣外勞數量自1990年代初便開始快速上升，至2004年8月底合法引進外勞已達三十萬人以上。¹¹ 由於1990年代我國失業率亦呈現上升趨勢，加上受到經濟結構轉型、內部政經及社會制度劇烈變革，及國際景氣循環的影響，1996年後台灣失業率開始逐步上升並開始居高不下（Lee 2002; 李誠 2003）。因此外勞是否已影響到本勞就業機會及外勞對我國整體經建是否開始產生負面效果，在國內開始變成一個相當具有爭議性的政策議題。¹²

面對日增的衝擊，外勞對本勞影響的學理分析可概分為兩種情況來討論，即促進本勞權益的正面互補效果（complementary effect）及損害本勞就業的負面替代效果（displacement effect）和阻礙效果

¹¹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統計處《勞動統計月報》（<http://dbs1.cla.gov.tw/stat/catlg00.htm>，取用日期：2004年8月31日）。

¹² 相對於一般以經濟效益為引進外勞的衡量標準，曾熾芬（2003）以國族政治的角度探討引進外勞的相關問題。

(discouraging effect)。由於居高不下的失業率，台灣的學界在研究外勞對本勞衝擊時自然有相當的比例是在探討外勞對本勞就業的影響，因此這將是本節回顧的重點。另外，在研究遷徙問題時，學界傳統上習慣將內部遷徙及跨國遷徙當成兩個獨立的面向來處理，認為二者是兩個互不相干的議題，但這種傳統的思維現已證明是錯誤的，事實上內部遷徙及跨國遷徙二者是高度相依的，而且通常存在某種程度的衝突和矛盾，因此本節另一重點將擺在跨國遷徙對台灣內部遷徙的影響。

(一) 外勞對本勞就業影響的問題

國內有關外勞對本勞就業影響的實證研究結果係相當分歧的。吳惠林及王素鸞（2001）認為理論上引進外勞可能對本勞產生替代或互補效果，也可能與資本或技術產生互動，而且也可能衍生出不良的外部效果，但最終影響為何則無肯定的答案。朱雲鵬及廖惠珠（1992）研究顯示引進外勞對國內經濟的影響除了不利產業升級外，亦無法挽回部分勞力密集產業（如紡織業）的困境，但另一方面卻提高國內總生產毛額、利潤、投資及增加總工資所得和儲蓄的效果，更可降低國內綜合物價。

馬凱及吳惠林的研究（1996）顯示，外勞對本勞工作影響是替代或補充效果都難以判斷，但整體而言僱用外勞有助增加本地勞工之就業。不過徐美等人（1998）研究外勞與各類勞動間的替代或互補關係，發現外勞與國內各類勞工間有替代的關係，也有互補性的關係，此一替代與互補並存關係隱含了引進外勞並不會惡化國內各類勞工的就業機會與薪資水準，甚至可能會出現改善的情況。

不過一些研究外勞對本國勞工（以下簡稱本勞）就業的影響，發現外勞對本勞有產生就業的替代效果（單驥 1996；Tsay and Lin 2001；藍科正 2001）；例如，單驥（1996）的研究發現外勞與本國各類勞工間存

在著相當穩定的替代關係，其結論是大量僱用外勞將不利於國內資本及技術勞工之使用及不利於國內產業升級，因此建議應先凍結外勞核准使用的總量，再逐步降低外勞使用量以免僱用外勞對國內弱勢勞工就業機會產生不利影響。藍科正（2001）以畢氏曲線觀察引進外勞與失業關係，認為外勞對本勞就業雖有負面影響，自1994年以來外勞已由補充走向替代本勞的效果，但主要在原先僱用外勞行業工作的本勞選擇原職業的機會減少，但其他行業提供了新的就業機會，故負面影響未顯現。

張昌吉（2002）認為引進外勞對國內確實具有短期的經濟效益，但長期而言卻會對就業市場產生負面影響，由本來的補充性轉變成替代性，對國人就業與薪資產生不利影響；此外亦可能阻礙企業產業升級及增加社會成本。成之約及辛炳隆（2002）的研究認為引進外籍監護工與家庭幫傭不盡然會促使沒工作的女性雇主投入就業市場，但對於擁有工作的女性雇主之就業則會產生正向的穩定效果。林津如（2000）的研究發現到「外傭政策」剝削了在台灣處於階級或族群弱勢之女性，使其在勞動市場形成競爭關係，而中高收入的家庭反而得利於此。

在外勞對本勞失業的影響部分，蔡青龍及林季平（2000）的研究有較精密的計算。該研究結果指出，在控制住經濟結構轉型的因素下，外勞對本勞的就業確實有負面作用，近年快速增加的基層勞工失業情形，有部分原因是由於外勞對他們就業的替代作用所造成的；外勞對本勞就業的負面影響主要出現在外勞密集的行业，即製造業、營造業、和社會及個人服務業（對屬製造業的電機電子業和營造業的半技術工和低技術工影響最大），但在別的行业外勞的負面影響並不顯著。

蔡青龍及林季平（2000）的研究雖證實外勞對本土專業工作者有互補性，但外勞對本土專業人員的互補性是具有跨外勞密集行业的特性；也就是說，外勞對本國專業工作者之互補性係出現在非外勞密集的行

業，在外勞密集的行业，其互補性反而看不出來；研究的模擬計算結果顯示，若系統性調節在製造業、營造業、和社會及個人服務業的外勞人數，外勞每增減15,000人左右，總體失業率約增減0.1個百分點；研究的政策意涵是在外勞密集的行业，由於外勞對專業人員就業無明顯互補性，但對基層勞工則有取代作用，由於基層勞工數多於專業人員，因此外勞對外勞密集行业之影響是弊大於利；但在外勞不密集的行业，由於外勞對專業人員具有互補性及外勞對其基層勞工無明顯取代作用，故引進外勞是利大於弊。

至於外勞對本勞工作異動（job turnover）的影響部分，蔡青龍及林季平（1999）的研究顯示外勞對本勞之工作異動已產生影響，不同類型之本勞對外勞有不同的「反應」；一般而言，無論是失業或變換工作，受外勞負面影響的本勞主要是和外勞同質性高的低人力資本基層勞工，但專業經理人員則受惠於外勞所提供的勞務。在對本勞變換工作的影響部分，外勞對本土專業經理人員有一定程度的互補作用，但卻對本土年長及低層勞工有某種程度的排擠作用，特別是外勞對營造業中年以上低層男性勞工有很強的排擠作用；至於業間流動部分，外勞較多的行业並沒有使業間流動的本勞較難移入該行业，但外勞對同質性高的本勞之流入（例如低教育程度的被迫離職者和希望流入營造業的低技術勞工）有一定程度的阻礙作用。

前述研究成果有些不一致之處，筆者認為原因不是定義及理論不同，而是外勞影響於不同時期有不同效果所致。外勞對本勞的影響會有時間的遞延性，也就是說外勞對本勞影響不是一引進外勞就會立刻出現，筆者個人觀察約有二至三年的遞延效果，外勞於1994年前總數並不是很大，成長速度亦不快，但於1994-1998年間數量開始快速成長，之後穩定維持在30多萬人（不含非法外勞），故其影響在1996至1998年以

後開始逐漸顯現。

（二）外勞對本勞內部遷徙影響的問題

在談到外勞對本勞內部遷徙的衝擊前，觀念上我們需先要有一認知，那就是無論國內外，外勞於任一勞動市場之分布有一個很重要特徵，即外勞通常集中在少數幾個行業和地區。因此外勞對國內勞動市場之衝擊就猶如來自外太空的隕石撞擊地球一般；若該隕石不是一般小隕石時，地球的「撞擊」(impact) 點除承受相當大的衝擊之外，撞擊產生的「衝擊波」(shocking wave) 亦會使該衝擊擴散至全球而產生全面性的影響，間接促使地球環境及物種產生進一步的重組及改變，該觀點即所謂撞擊後產生的「漣漪效應」(the ripple effect)。利用上述比喻，當某些特定行業或地區受到外勞「撞擊」的力道夠大時，撞擊點除產生「隕石坑」之外，受衝擊之本勞亦會如同撞擊後飛離的物質而四處流動，進而產生內部勞動市場人力資源全面再分配的效果。

了解外勞對本勞內部遷徙的影響，目的在探討跨國遷徙對外勞接受國內部勞動市場人力資源再分配的洗牌效果。有關跨國遷徙對內部遷徙的影響，一般的假設是當大量外勞湧進時，不僅對外勞聚集地的本勞遷徙會產生推力，也可能阻止其他勞動市場勞工的流入，進而導致內部整體社會經濟體系人力重分配的效果。國外學界在這方面有很豐富的研究成果。

例如Manson等人(1985)發現移入南加州的墨西哥勞工對當地專業人士產生工作上的互補效果，但對當地低技術勞工卻產生替代效果。Filer(1992)研究272個美國的都會區，發現部分都會區的內部勞工流動和跨國遷徙流入呈現負向關聯。Frey(1996)和Frey等人(1996)進一步細分教育及技術程度來研究跨國遷徙對於國內遷徙的替代效果，發

現跨國遷徙對美國本土勞動市場已產生顯著影響。

利用美國 1990 年的普查資料，Frey 及 Liaw（1998）和 Liaw 等人（1998）進一步發現外勞對美國低人力資本的本勞確實有一排斥作用，但對高人力資本者卻具有某種程度的互補性。而且低技術外勞對本勞移出的排擠效果（displacing effect on out-migration）大於對外地本勞移入的阻礙效果（discouraging effect on in-migration）；也就是說，美國低技術本勞易被其原工作地外勞所取代而外移至別處（通常至臨近各州），美國外勞對外地要移入的本勞雖有阻礙性，但效果不是那麼強烈。而美國外勞對於美國本勞的排擠對象係以低技術、貧窮白人、和老人為主；由於受排斥者在流動後傾向流向鄰近勞動市場，因此對該市場的平均薪資水準及人力資本品質有一負面影響。

但另一方面，Card（1997）發現控制內部遷徙的決策因素之後，跨國遷徙對美國內部勞工州際遷徙並沒產生任何影響；Wright 等人（1997）利用 1980 和 1990 美國普查資料發現美國大都會區本勞的淨流失主要係導因為經濟結構變遷，並不是受跨國勞工移入的影響；Fairlie 及 Meyer（1997）使用美國人口普查研究 94 個大都會地區，指出國際勞工流入對美國內部遷徙可以說是無影響或僅是些微影響，但是對於男性黑人或是女性自營作業者則是有顯著的影響。

有關外勞對台灣本勞流動影響的研究，在台灣反而相當有限，目前主要成果來自 Lin（2002a, 2002b）的研究。Lin（2002a）的研究發現，外勞對本勞的內部遷徙確實已產生影響，特別是低人力資本的本勞；綜合本勞的遷離模型（departure model）及目的地選擇模型（destination-choice model of migrants）的研究成果，一般而言外勞對本勞沒有全面的排擠作用（pushing effect），但對和其同質性高的流動本勞之移入卻有全面的阻礙作用，該情形和在美國的發現相反。

Lin (2002b) 進一步以 Lin (2002a) 的研究成果為基礎，探討若政策性調節外勞數量後我國內部人力再分配將會如何全面「重新洗牌」的問題。其研究結果顯示外勞若增加 10%，高 FLV (foreign labor volume) 地區的淨勞工遷徙將減少 0.07%，但中 FLV 地區及低 FLV 地區之淨勞工遷徙將分別增加 0.15% 及 0.29%；由於外勞對本勞在移入的阻礙作用遠大於對本勞在移出的排擠作用，外勞對台灣內部勞工流動主要影響是阻礙低技術本勞往高 FLV 移轉，使低技術本勞只能在非外勞聚集地區間交換。

綜合上述討論，台灣自 1990 年代開始「門戶開放」之後，跨國遷徙對台灣的影響日趨明顯，其中最重大影響係來自引進大量的外勞。外勞對台灣內部的影響有很多層面，這裡回顧重點在對本勞就業的影響及對本勞內部遷徙的影響。眾多文獻顯示至 1990 年代末期時，雖然外勞對本勞專業技術人員的互補作用一直存在，但外勞對低技術本勞的就業亦出現部分的取代效果。此外，外勞對低技術本勞的就業取代效果有部分反映在對低技術本勞的內部遷徙裡，致使受影響的本勞開始往非外勞集中地遷徙。另外由於外勞對低技術本勞存在就業進入的阻礙效果，這亦間接致使非外勞集中地的低技術本勞難以透過勞工流動至外勞集中地就業 (參考圖 5)。

六、結論及討論

本文已回顧二十年來台灣的人口遷徙及勞工流動相關的社會及經濟問題，回顧及討論的重點主要涵蓋在四大議題，即 (1) 人口遷徙和勞工流動對台灣區域及都市發展影響的問題、(2) 台灣內部遷徙及邊際勞工流動問題、(3) 跨國遷徙問題，包括引進外勞、人才回流及外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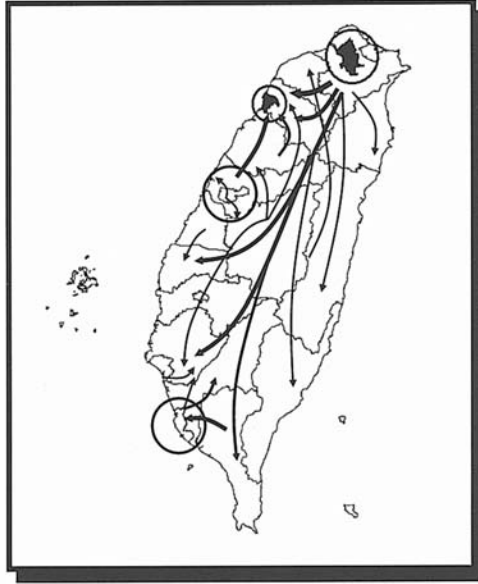


圖5 外勞對本勞內部遷徙影響趨勢：1996-2000

問題問題、及（4）台灣「門戶開放」後的衝突和矛盾，重點在跨國遷徙對本勞就業及內部遷徙的影響。

台灣的人口遷徙和勞工流動問題和過去二十年來大環境的變動息息相關。過去二十年來台灣內部經歷了許多「逆轉」的過程；例如，政治部分主要是經歷了權力結構「由上而下」至「由下而上」的轉變；經濟發展最重要的轉變是由「工業主義」轉變至「後工業主義」生產體系、及知識經濟興起；社會變遷主要是由封閉轉向開放，由單元趨於多元價值，資訊流動加快及網路社會之崛起；人口及勞動體系亦由將近一個世紀的封閉漸次走向開放並逐漸和世界體系整合，特徵是出生及死亡對人口及勞動供需之影響日減，而內部及跨國遷徙對人口成長及分布影響力日增；都市及區域發展則由日治時期1930年代即已確立的南北雙極發展

態勢，並持續了將近60年後，但在1980年代進入後蔣經國時期後開始發生結構性變動，肇因於區域經濟結構轉型和總體經濟結構轉型的大方向不一致，確立了北部的完全區域優勢及造成了南部區域之沒落，勞工及人力之移轉由典型南北分流轉變成為至北部的淨移轉。

有關人口遷徙和勞工流動對台灣區域及都市發展影響的問題部分，近二十年來的經濟結構的轉型和全球化的浪潮明顯改變台灣區域經濟發展結構以及勞工流動的趨勢。1980年代中期以後台灣人口遷徙及勞工流動主要型態係人力資源由其他地區至北部地區（特別是台北縣市及桃園縣）的淨移轉，該項流動型態和1930-1970年代間勞工向南北分流的型態完全不同，因此1980年代末可稱為台灣勞工流動「逆轉」的年代。如此重大的人力配置變遷對1990年代台灣政經、社會及區域發展有深遠影響。台灣發展較為緩慢的區域皆面臨人口流失問題，整個台灣的人口遷徙及勞工流動仍舊是往都市集中，特別是北部地區。雖然人口遷徙及勞工流動具有促進人力資本於勞動市場中移轉的正面效果，但另一方面卻有惡化區域間人力資本的質與量不平衡的反向效果。這種「雙刃」效果對台灣區域及都市發展產生極化現象及發展的兩難局面。

雖然人口遷徙及勞工流動對台灣的區域及都市產生極化發展的問題，但有兩點值得強調：第一、雖然台灣的人口遷徙及勞工流動使內部人力質與量再分配產生極化情形，並促使區域和都市的社會經濟發展產生不均狀況，但和國外相較之下台灣這方面的問題事實上並不算嚴重，主因係中央政府對地方的財政補助及外移人口的匯款（remittances）產生的平衡效果；第二、不像北美中上層階級通常選擇移往市郊，致使中心都市通常是社會底層人口聚集的地方，台灣的衛星城市並不存在正向教育選擇性，台灣的人口遷徙及勞工流動並未造成衛星都市人力資本質量改善及中心都市人力資本質量惡化的情況。

有關台灣內部遷徙及邊際勞工流動問題，總體而言台灣內部的人口遷徙及勞工流動變遷大方向和區域經濟及勞動市場結構轉型方向相當一致，故似乎不需要政策加以干預，只要順勢由「看不見的手」自行推動就行。雖然人口遷徙及勞工流動雖有調節人力之作用，但其強烈的選擇性則使人力資源分布之異質性進一步擴大，減少「錯誤」的初級遷徙及「不必要」重複遷徙是促進市場人力運用效率及減低遷徙社會成本的方式之一。但是部分重複遷徙（特別是連續遷徙）係單純的由市場機制所引導，且該過程有助於促進勞動市場人力運用效率，實質上沒有必要以政策干擾此一自然過程。政策真正所該留意及干預的是減少因失望所導致的重複遷徙，因失望類型的重複遷徙和上次遷徙時的錯誤遷徙決策有關，從政策面來看，重點應朝促進市場資訊的開放程度及流通速度二方面著手。

在邊際勞工流動的問題部分，初步的研究結果得知台灣的失業勞工流動於解決失業者再就業的機制開始有失靈的現象產生，但問題是造成該機制失靈的原因何在，目前國內學界尚未深入研究，為舒緩目前失業問題，這是值得我們進一步深入探討的研究議題。至於被迫離職者的問題，由於被迫離職者相較於自願離職者在離職後個人福祉及社經地位有明顯「向下沉淪」現象，故被迫離職者係未來社會不穩定因子的高危險群，被迫離職者的潛在問題有賴以主動積極勞動政策預防未來可能發生的問題，防止該潛在問題未來進一步惡化。

至於原住民勞工流動最大的問題，筆者認為係遷徙在改善個人或家庭社經地位及所得水準的正面效果在台灣原住民流動看來並不是很顯著；國內雖有不少原住民遷徙研究，但這方面問題的探討則尚未出現，故值得我們關注；另外我們經常看到有關外勞和原住民工作衝突問題的討論或研究，但問題是目前學界在外勞對原住民勞工就業及遷徙的影響

程度到底有多大和影響的層次為何目前尚未掌握住，筆者認為由於台灣2000年戶口普查首次提供原住民普查資訊，故原住民這方面問題的研究變得可行且值得學界投入。

台灣目前面臨的跨國遷徙問題較重要的屬大量輸入的低技術外勞、及資本外流所帶動的人才外流問題。但筆者認為前述三大跨國遷徙問題，對台灣內部社會及經濟影響層面最為深遠者（無論直接抑或間接）當屬為數眾多的合法及非法外勞，但由於外勞移入台灣已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目前社會大眾對其造成的直接及間接問題似乎有些「麻木」，目前社會反而花較多的注意力在外籍配偶的社會及文化調適問題上面；至於台灣和中國經貿整合程度加深導致人力外流至中國大陸的問題，有人認為是嚴重的人才外流問題，但筆者認為由於兩岸經濟活動及產業結構尚有很大區隔，遷徙至中國工作的人並非台灣嚴重欠缺的人才，故筆者認為這只是一般人力外流，尚不構成人才外流的問題。

台灣「門戶開放」後大量移入的外勞對本勞的影響主要反映在對本勞就業及本勞內部遷徙的問題上。台灣有關外勞對本勞就業影響的實證研究結果早期係相當分歧，但隨著外勞於1990年代中期後開始在國內迅速增加後，有關外勞對本勞影響的研究結果變得愈來愈清楚，本土專業經理人員基本上是外勞所提供的勞務之受惠者，但和外勞同質性高的低人力資本的本勞則易受外勞負面效果的影響，且近年快速增加的基層勞工失業有部分原因係由外勞的替代作用所致。

外勞對本勞的另一重大影響是我國內部人力分配的問題，台灣的實證結果發現外勞對低技術本勞的就業取代效果有部分反映在低技術本勞的內部遷徙裡面，外勞對本勞沒有全面的排擠作用，但對和其同質性高的流動本勞之移入卻有全面的阻礙作用。我們知道外勞集中地是台灣社經發展的精華地帶，運用外勞有利有弊，但我們一般所忽略的問題是運

用外勞的正面效果係直接出現在外勞集中地，而其負面效果卻不會在外勞集中地表現出來，而係間接出現在非外勞集中地，這表示台灣運用外勞的成本效益之空間分布事實上是存在著不平等的關係。

我國內部勞動市場於1990年代開始對國際開放後，跨國遷徙對台灣內部影響力日增所衍生的矛盾及衝突是我們要付出的代價。這些代價可透過政策手段將其負面影響減至最低，但問題是筆者認為我國外勞政策相當缺乏彈性及決策者常未體察情勢變化，以至於我國外勞政策缺少政策之有效性；前述論點是基於下列二點理由：第一、我國第一次政黨輪替前的執政黨對外勞衍生的問題可謂充耳不聞，完全無法體察發酵中的相關社會經濟問題，而放任問題日漸惡化；第二、第一次政黨輪替後的執政黨雖於選前已正視該問題而將緊縮外勞納入政見，但第一次政黨輪替後的執政黨事實上並沒有落實該項政策，期間雖曾凍結泰國及印尼勞工，但皆係起因於政治爭執事件而非基於保護我國社會經濟因素為出發點。

台灣目前內部和跨國遷徙的矛盾和衝突問題解決之道，筆者認為需要很大的智慧，在面對前述問題時，重點是如何將跨國遷徙的後遺症及政策盲點減至最低。筆者認為我國內部勞動市場不能自外於國際勞動市場，故全面禁止外勞絕對不是理性的解決方案，但在政策設計上有二點值得去思考改進；第一、適量縮減低階外勞是必要的，理由是低階外勞對我國同質性高的本勞之取代及阻礙效果已相當明顯，沒理由不加以限制；本文當然無法回答最適外勞數量為何，但可透過精算及統計模擬方式來規劃縮減低階外勞的最佳方式，而且縮減低階外勞時要將政治考量降至最低；第二、我國外勞政策除有前述盲點外，另一很大的盲點是過去十多年來，我們在政策上一直忽略鼓勵外籍專業人員移入；外籍專業人員移入雖對我國專業人員之就業等可能造成衝擊，但以其他已開發國

家例子來看，其正面效益應絕對遠大於其負面影響，故政策上應設法減少外籍專業人員移入我國的障礙。

本文雖已就台灣的人口遷徙及勞工流動研究文獻做回顧，目前既有文獻還是有其未竟之處，尚有些議題及問題有待後續研究。首先，在研究的理論部分，無論是內部遷徙抑或跨國遷徙研究，國內相關文獻在理論建構部分尚嫌不足，筆者認為目前有待進一步加強的為「新」經濟學派（new economics of migration）的理論應用於台灣的研究（Stark 1991）；筆者認為該學派的理論及觀點（即遷徙係由相對剝奪感（feelings of relative deprivation）所驅動、遷徙是分散風險（risk diversification）決策、及遷徙匯款（remittances of migration）是利他主義（altruism）的結果）很適合用來解釋台灣目前及未來面臨的情況，特別是屬於跨國遷徙的外勞及外籍新娘移入問題。

最後，就實證研究而言，筆者認為目前有二個議題學界尚未掌握得很清楚，值得未來進一步投入。第一個議題是失業勞工流動的研究；失業勞工流動研究在台灣目前尚在起步階段，遑論失業勞工的回流流動及連續流動的研究，有鑑於我國勞工流動在促進失業者再就業的機制可能開始出現失靈現象，因此筆者認為探討其失靈原因及進行失業勞工的回流流動及連續流動研究是了解失業勞工再就業過程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第二個議題則是外來移民在台灣內部遷徙（internal migration of immigrants）的研究；該研究議題重要性是台灣已和其他已開發國家類似，跨國移民已逐漸融入我國內部社經體系，和其他國家相較之下，我們對外來移民的內部遷徙過程及結果並不清楚，故無從得知和我國一般內部遷徙的互動關係，因而值得進行詳細研究。

作者簡介

林季平，加拿大 McMaster University 地理學博士，目前為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副研究員及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主要研究及擅長領域為人口遷徙及勞工流動、經濟及醫療地理學、離散選擇理論及離散資料分析。

參考書目

- 成之約、辛炳隆，2002，〈外籍幫傭與監護工引進對國內就業影響之初探〉。《勞資關係論叢》11: 69-94。
- 朱雲鵬、廖惠珠，1992，〈引進外籍勞工之成本與效益研究〉。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委託研究計畫。
- 行政院主計處，2002，〈2000年戶口及住宅普查提要分析〉。台北：行政院主計處。
-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2002，〈九十一年台灣原住民就業狀況調查報告〉。台北：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
- 吳惠林、王素灣，2001，〈外籍勞工在台灣之趨勢、經濟關聯與政策〉。《人口學刊》22: 49-70。
- 吳惠林、張清溪，1991，〈台灣地區的勞力短缺與外籍勞工問題〉。台北：中華經濟研究院。
- 李誠，2003，〈後充分就業時代的來臨〉。頁3-39，收錄於李誠編，〈1996年以來台灣失業問題—誰偷走了我們的工作〉。台北：天下文化。
- 林季平，2003，〈提升失業者再就業的機會：勞動移動〉。頁339-371，收錄於李誠編，〈1996年以來台灣失業問題—誰偷走了我們的工作〉。台北：天下文化。
- 林季平、柯音如，2004，〈勞工流動及資訊流動的初探研究〉。《資訊社會研究》6: 283-312。
- 林季平、章英華，2003，〈人力運用擬—追蹤調查資料庫的產生過程、應用現況、及未來發展〉。《調查研究》13: 39-69。

- 林柏生、黃登興、黃幼宜，2002，〈勞動力調整機制與鄉村勞動力回流〉。頁269-295，收錄於台灣經濟學會編，《2001年台灣經濟學會年會論文集》。台北：台灣經濟學會。
- 林津如，2000，〈「外傭政策」與女人之戰：女性主義策略再思考〉。《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9: 93-151。
- 林祖嘉，1991，《工作搜尋模型、失業期間與保留工資：台灣地區大專畢業生之經驗》。行政院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計畫編號：NSC 80-0301-H-004-003。
- 林穎寬，2002，《嘉義地區原住民就業狀況及其歸因》。嘉義：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碩士論文。
- 姜蘭虹、趙建雄、徐榮崇，1998，〈當代華人海外移民〉。論文發表於「跨世紀臺灣的人口與相關現象研討會」，台北：台灣人口學會，民國87年3月21日至22日。
- 施添福，1979，〈臺灣人口成長及其空間集中過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地理研究報告》5: 158-181。
- 洪嘉瑜、陶宏麟、蔡智發，2003，〈影響台灣內部遷徙的經濟因素探討〉。《經濟論文叢刊》31(2): 253-277。
- 孫清山，1997，〈戰後台灣都市之成長與體系〉。頁64-103，收錄於蔡勇美、章英華編，《台灣的都市社會》。台北：巨流圖書。
- 徐美、陳明郎、吳孟道，1998，〈外籍勞工與國內生產要素間替代互補關係之探討—以台灣製造業為例〉。頁65-91，收錄於台灣經濟學會編，《1997年台灣經濟學會年會論文集》。台北：台灣經濟學會。
- 徐進鈺，1999，〈流動的鑲嵌：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的勞動力市場與高科技發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5: 75-118。
- 徐榮崇、姜蘭虹，2001，〈澳洲台灣移民居住地選擇因素與遷徙過程—

- 以雪梨和布里斯本爲例)。《中國地理學會會刊》29: 39-71。
- 馬凱、吳惠林，1996，《合理外勞人數推估模式之研究》。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委託研究計畫。
- 張昌吉，2002，〈外籍勞工對經濟、社會、政治層面影響之分析〉。《政大勞動學報》12: 257-294。
- 張曉春，1974，〈台北地區山地移民調適初步調查研究（上）（下）〉。《思與言》11(6): 1-21。
- 莊慧玲，1993，《就業者與失業者工作搜尋效率之比較》。行政院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計畫編號：NSC 82-0301-H-007-012。
- 陳明郎，1992，〈造成高失業率的原因及其對策：均衡搜尋模型〉。《經濟論文》20(3): 241-266。
- 陳肇男，1990，〈台灣地區各類型遷移之選擇性與差異性〉。《人口學刊》13: 43-57。
- 陳寬政，1981，〈臺北都會區的人口分布與變遷〉。《人口學刊》5: 51-69。
- 陳寬政、廖正宏，1984，〈人口遷移與就業〉。《人口學刊》7: 107-128。
- 章英華，1986，〈清末以來台灣都市體系之變遷〉。頁233-273，收錄於瞿海源、章英華編，《台灣社會與文化變遷》。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章英華，1997，〈台灣的都市體系—從清到日治〉。頁34-61，收錄於蔡勇美、章英華編，《台灣的都市社會》。台北：巨流圖書。
- 傅仰止，1985，〈都市山胞研究的回顧與前瞻〉。《思與言》23(2): 177-193。
- 傅仰止，1987，〈都市山胞的社經地位與社會心理處境〉。《中國社會

學刊》11: 55-79。

傅仰止，1994，〈台灣原住民困境歸因解釋：比較漢人觀點與原住民觀點〉。《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77: 35-38。

傅仰止，2001，〈都市原住民概說〉。頁1-49，收錄於蔡明哲編，《台灣原住民史：都市原住民史篇》。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單驥，1996，〈外籍勞工、技術、非技術人員與資本之間替代關係之探討：以台灣製造業為例〉。頁39-71，收錄於陳肇男編，《人口、就業與福利》。台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曾熾芬，1997，〈居留權的商品化：台灣的商業移民市場〉。《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7: 37-67。

曾熾芬，2003，〈引進外籍勞工的國族政治〉。《台灣社會學刊》32: 1-58。

黃台心、林志明，2001，〈我國勞工在工作狀態間之流動分析〉。《經濟論文叢刊》29(4): 511-546。

黃毅志，2001，〈都市原住民階層變遷史〉。頁51-89，收錄於蔡明哲編，《台灣原住民史：都市原住民史篇》。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楊成安，1984，《國人海外移民現況與動機探討之研究》。台北：內政部人口政策委員會。

熊瑞梅，1984，〈台灣一般連續及回流遷移模式探討〉。《東海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 63-78。

熊瑞梅，1988，《人口流動—理論、資料測量與政策》。台北：巨流圖書。

熊瑞梅，1990，〈臺灣都會人口遷移及有關區位擴張的假設檢定〉。《中國社會學刊》14: 65-95。

- 劉梅君，2002，《老虎鉗下的外勞勞動人權：我國外籍勞工勞動人權之探索》。行政院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計畫編號：NSC 91-2412-H-004-013。
- 劉曉融，2004，《台灣原住民勞工流動及工作地選擇要素》。嘉義：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碩士論文。
- 蔡宏進，1986，〈鄉村與都市的就業連結：概念、事實與假設〉。《中國社會學刊》10: 1-15。
- 蔡宏進，2000，〈台灣與東亞及東南亞國家與地區間人口對流的類型與變遷〉。《人口學刊》21: 1-35。
- 蔡明璋、陳嘉慧，1997，〈國家、外勞政策與市場實踐：經濟社會學的分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7: 69-95。
- 蔡青龍、林季平，1999，《經濟結構轉型與勞動市場變化：台灣經濟部門內／間之勞動力流動》。台北：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 蔡青龍、林季平，2000，《外籍勞工對本國勞工工作異動之影響分析》。台北：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 蔡瑞明，1984，《台灣高山族社會流動之研究》。台北：台灣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
- 謝高橋，1991，《台灣山胞遷移都市適應問題之研究》。台北：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 謝高橋、蔡宏進，1989，《人民外移現況及問題之探討》。台北：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 瞿海源，1983，〈台灣山地鄉的社會經濟地位與人口〉。《中國社會學刊》7: 157-175。
- 藍科正，2001，〈勞動力跨國移動政策—台灣引進外勞的經驗〉。頁25-65，收錄於詹火生編，《新經濟世紀的勞動政策》。台北：厚生基

金會。

邊瑞芬，1991，〈台灣地區縣市社經發展與人口遷移的關係〉。《人口學刊》14: 83-108。

Barclay, George W., 1954, *Colonial Development and Population in Taiwa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aum, Julian, 1994, "Home Sweet Home: Returning Expatriates Fuel Taiwan's Hi-tech Growth."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57(39): 66-67.

Bell, Daniel, 1976,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 New York: Basic Books.

Boehm, Thomas P., Henry W. Herzog, Jr. and Alan M. Schlottmann, 1998, "Does Migration Matter? Job Search Outcomes for the Unemployed." *Review of Regional Studies* 28(1): 3-12.

Borjas, George J., Richard B. Freeman and Lawrence F. Katz, 1996, "Searching for the Effect of Immigration on the Labor Market."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6: 246-251.

Card, David, 1997, "Immigrant Inflows, Native Outflows, and the Local Labor Market Impacts of Higher Immigration." NBER Working Paper, No. 5927. Cambridge, M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BER).

Castells, Manuel, 2000,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Williston, VT: Blackwell Publishers.

Chang, Shirley L., 1992, "Causes of Brain Drain and Solutions: The Taiwan Experience."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7(1): 27-43.

- Chen, Shyh-Jer, 1995, "Migrant Selectivity and Returns to Skills: The Case of Taiwanese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33(2): 251-274.
- Chen, Shyh-Jer, 1998, "Characteristics and Assimilation of Chinese Immigrants in the U.S. Labour Market."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36(2): 187-210.
- Clark, Cal, 1989, *Taiwan's Development: Implications for Contending Political Economy Paradigms*. Westport, CT: Greenwood.
- Copper, John F., 1988, *A Quiet Revolution: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shington, DC: 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Center.
- DaVanzo, Julie S., 1977, "Migration Patterns and Income Change: Implications for the Human Capital Approach to Migration: Comment."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44(2): 391-393.
- DaVanzo, Julie S., 1981, "Repeat Migration, Information Costs, and Location-specific Capital." *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 4(1): 45-73.
- DaVanzo, Julie S., 1983, "Repeat Mig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Who Moves Back and Who Moves on?"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65(4): 552-559.
- Dijk, Jouke Van, Hendrik Folmer, Henry W. Herzog, Jr. and Alan M. Schlottmann, 1989, *Migration and Labor Market Adjustment*. Dordrecht, Netherland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Fairlie, Robert W. and Bruce D. Meyer, 1997, "Does Immigration Hurt African-American Self-employment?" NBER Working Paper, No. 6265. Cambridge, M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BER).
- Fields, Gary S., 1994, "The Migration Transition in Asia."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3(1): 7-30.

Filer, Randall K., 1992, "The Effect of Immigrant Arrivals on Migratory Patterns of Native Workers." Pp. 245-270 in *Immigration and the Work Force: Economic Consequenc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rce Areas*, edited by George J. Borjas and Richard B. Freem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rey, William H., 1996, "Immigration, Internal Migration and Demographic Balkanization in America: New Evidence for the 1990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2: 741-763.

Frey, William H. and Kao-Lee Liaw, 1998, "The Impact of Recent Immigration on Population Redistribution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Pp. 388-448 in *The Immigration Debate: Studies on the Economic, Demographic, and Fiscal Effects of Immigration*, edited by James P. Smith and Barry Edmonston.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Frey, William H., Kao-Lee Liaw, Yu Xie and Marcia J. Carlson, 1996, "Interstate Migration of the US Poverty Population: Immigration 'Pushes' and Welfare Magnet 'Pulls'." *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 17(6): 491-536.

Gold, Thomas B., 1986,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Taiwan Miracle*. New York: M. E. Sharpe .

Grant, E. Kenneth and John Vanderkamp, 1980, "The Effects of Migration on Income: A Micro Study with Canadian Data 1965-71."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3(3): 381-406.

Herzog, Jr., Henry W., Alan M. Schlottmann and Thomas P. Boehm, 1993, "Migration as Spatial Job Search: A Survey of Empirical Findings."

- Regional Studies* 27(4): 327-340.
- Ip, David, 2001, "A Decade of Taiwanese Migrant Settlement in Australia: Comparisons with Mainland Chinese and Hong Kong Settlers." *Journal of Population Studies* 23: 113-145.
- Iredale, Robyn, 2000, "Migration Policies for the Highly Skilled in Asia-Pacific Region."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4(3): 882-906.
- Kanjanapan, Wilawan, 1992, "White-collar Foreign Workers in Taiwan."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1(3/4): 569-583.
- Kendrick, John W., 1961, *Productivity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uo, Shirley W. Y., 1983, *The Taiwan Economy in Transi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 Lee, Joseph S., 2002, "The Role of Low-skilled Foreign Workers in the Process of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Asia Pacific Business Review* 8(4): 41-66.
- Lee, Joseph S. and Su-Wan Wang, 1996, "Recruiting and Managing of Foreign Workers in Taiwan."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5(2-3): 281-301.
- Lewis, G. J., 1982, *Human Migration: A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London: Croom Helm.
- Li, K. T., 1988,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Taiwan*. London: Shephard-Walwyn .
- Liao, Cheng-Hung, 1988, "Urbanization in Taiwan: 1900-1985." *Journal of Population Studies* 11: 129-162.
- Liaw, Kao-Lee and Ji-Ping Lin, 2001, "Primary Migration of the Taiwanese

- Young Labor Force in the Context of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Globalization: An Explanation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1990 Census.” *Journal of Population Studies* 29: 7-28.
- Liaw, Kao-Lee, Ji-Ping Lin and William H. Frey, 1998, “Impacts of Low-Skilled Immigration on the Internal Migration of the US-Born Low-Skilled Americ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Assessment in a Multivariate Context.” *Journal of population studies* 23: 5-24.
- Lin, Ji-Ping, 1998, *Labor Migration in Taiwa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Geology, McMaster University, Ontario, Canada.
- Lin, Ji-Ping, 2000, “Labor Migration in Taiwan, 1600-2000.”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f Problems of Population, Family, and Migration in the New Millenniu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pril 21-22.
- Lin, Ji-Ping, 2002a, “Impacts of Foreign Labor on the Internal Migration of Domestic Labor: The Case of Taiwan.” Pp. 329-363 in *2001 Taiwan Economic Association Annual Conference Proceedings*, edited by Taiwan Economic Association. Taipei, Taiwan: Taiwan Economic Association.
- Lin, Ji-Ping, 2002b, “Immigration ‘Pushes’ and Domestic Labor ‘Flights’ : Impact of Foreign Labor on Manpower Redistribution of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XVth ISA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Brisbane, Australia, July 7-13.
- Lin, Ji-Ping and Ching-Lung Tsay, 2000, “Labour Migration and Allocation of Human Resources: The Cases of Return and Onward Movements.”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9(1): 1-34.

Lin, Ji-Ping and Kao-Lee Liaw, 1999, "Return and Onward Migrations and Their Determinants of the Young Labor Force in Taiwan: Evidence From the Data of the 1990 Census." *Journal of Population Studies* 20: 63-92.

Lin, Ji-Ping and Kao-Lee Liaw, 2000, "Labor Migrations in Taiwan: Characteriz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1990 Censu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2(9): 1689-1709.

Lin, Ji-Ping, Kao-Lee Liaw and Ching-Lung Tsay, 1999, "Determinants of Fast Repeat Migrations of the Labor Force: Evidence from the Linked National Survey Data of Taiwan."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1: 925-945.

Long, Larry, 1988, *Migration and Residential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Manson, Donald M., Thomas J. Espenshade and Thomas Muller, 1985, "Mexican Immigration to Southern California: Issues of Job Competition and Worker Mobility." *Review of Regional Studies* 15: 21-33.

Mullan, Brendan P., Chun-Hao Li, Rita S. Gallin and Bernard Gallin, 1998, "Family and Internal Migration in Taiwan."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7(1): 43-66.

Peixoto, Joao, 2001, "The International Mobility of Highly Skilled Workers in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The Macro and Micro Factors of the Organizational Migration of Cadr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5(4): 1030-1053.

Potts, Lydia, 1990, *The World Labour Market: A History of Migration*. New

Jersey: Zed Books.

- Prasai, Surya B., 1993, "Intra-Asian Labor Migration: Redefining the Implications." *Asian Survey* 33(11): 1055-1070.
- Ranis, Gustav, 1992, "From Developing to Mature Economy: An Overview." Pp. 1-14 in *Taiwan: From Developing to Mature Economy*, edited by Gustav Ranis. Boulder, CO: Westview.
- Sassen, Saskia, 1988, *The Mobility of Labor and Capital: A Study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Labor Flow*.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assen, Saskia, 1991,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elya, Roger M., 1992, "Illegal Migration in Taiwan: A Preliminary Overview."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6(3): 787-805.
- Sjaastad, Larry A., 1962, "The Costs and Returns of Human Migr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0(Supplement): 80-93.
- Solow, Robert M., 1957, "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39: 214-231.
- Speare, Alden, Jr., 1974, "Urbanization and Migration in Taiwa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2(2): 302-317.
- Speare, Alden, Jr., Paul K. C. Liu and Ching-Lung Tsay, 1988, *Urba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Rural-urban Transition in Taiwan*. Boulder, CO: Westview.
- Stark, Oded, 1991, *The Migration of Labor*. Cambridge, MA: Blackwell Publishers.
- Todaro, Michael P., 1985, "Urbanization and Migration: Internal and

International.” Pp. 247-284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Third World*, edited by Michael P. Todaro. New York: Longman.

Toffler, Alvin, 1980, *The Third Wave*. New York: Morrow.

Tsay, Ching-Lung and Ji-Ping Lin, 2000, “An Analysis of the Re-employment Conditions of the Involuntary Job-change Workers in Taiwan.” Pp. 73-93 in *Recent Developments in Involuntary Unemployment in Asian Countries: Causes and Policies*, edited by Joseph S. Lee. Taiwan: Research Center for Taiwan Economic Development,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Tsay, Ching-Lung and Ji-Ping Lin, 2001, “Labor Importation and Unemployment of Local Worker in Taiwan.” *Asia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10(3-4): 505-534.

Tsay, Ching-Lung and Ji-Ping Lin, 2003, “Return Migration and Reversal of Brain Drain to Taiwan: An Analysis of the 1990 Census Data.” Pp. 273-292 in *Mig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Population, Settlement and Citizenship Issues*, edited by Robyn Iredale, Charles Hawksley and Stephen Castles Edward.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Tsay, Ching-Lung, 1992, “Clandestine Labor Migration to Taiwan.”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1(3-4): 637-655.

Tseng, Yen-Fen, 1995, “Beyond ‘Little Taipei’ :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ese Immigrant Business in Los Angel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1(1): 33-58.

Tzeng, Rueyling, 1995, “International Labor Migration through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9(1): 139-154.

Wright, Richard A., Mark Ellis, and Michael Reibel, 1997, "The Linkage between Immigration and Internal Migration in Large Metropolitan Areas in the United States." *Economic Geography* 73(2): 234-254.